

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下的历史观问题

——以 2013 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为例

黄 贝

内容提要 2012 年 12 月安倍内阁上台之后,首相官邸逐渐主导了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这一趋势在历史观问题上表现尤为突出。在决策过程中,安倍个人的历史观、安倍智囊团及“安倍团队”以及官邸外部因素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安倍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参拜靖国神社的决策正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安倍个人的政治取向及考量起到了主导作用,安倍智囊及内阁成员则从首相的立场出发从旁进行协助,而首相官邸外部因素如国内舆论、中美韩各国的态度也对最终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 安倍内阁 首相官邸 历史观 政治决策 参拜靖国神社

自 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首相以来,日本谋求国家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在经济、外交、安保等方面采取积极举措,相继推出了“安倍经济学”、“俯瞰地球仪外交”和“积极和平主义”等战略或政策,并在安保领域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在这些政治决策的背后,以安倍为核心的首相官邸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首相官邸主导的决策模式也受到学界与日俱增的关注。许多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安倍内阁对首相权力的强化使得日本政治决策模式从“官僚主导”转向“官邸主导”的趋势愈发显著,首相官邸已成为日本内政外交政策决策的中心。^①

作为安倍内阁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历史观相关问题的决策过程集中体现了首相官邸的主导作用。在靖国神社、慰安妇、历史教科书等问题上,日本政府动作频频,表现出与安倍个人立场一致的强烈色彩,安倍更是罔顾中韩两国的强烈抗议与国际社会的劝诫,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实现了日本在任首相时隔七年之后对靖国神社的首次参拜,使日本在历史观问题上与他国的矛盾一时激化至顶点。2015 年 1 月 25 日,负责起草“安倍谈话”的首相私人咨询会议正式召开,安倍内阁主导的历史观问题决策过程进一步引发各界的关注。本文将主要关注首相官邸主导下的历史观问题决策过程,对影响安倍内阁历史观问题决策的诸多因素进行讨论,并以 2013 年 12 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为例对此决策过程加以解释。

一、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战后初期,日本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官僚主导型决策模式,官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该模式对日本战后的重建和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官高政低”的模式逐渐向“政高官低”转变,“族议员”的兴起使政治家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发言权不断提升,官僚的主导地位渐渐被政治家所取代。此后,政治决策过程中官僚、政党、政府的互动关系作为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持续引发了诸多讨论。其中,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也

于政治实践中产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

首相官邸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地位的提升始自中曾根康弘时期。在此之前,受政体、政党体制、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首相大多扮演着政策协调者的角色,首相官邸在决策过程中几乎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中曾根上台后,建设“政治大国”的理念呼唤一个强有力的首相的出现。为此,中曾根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以加强首相官邸的职能,将内阁官房中担任政策工作的审议室分为内政和外政两个审议室,并增加了安全保障室,建立了“内阁官房五室制”。同时,中曾根重视首相智囊团的作用,设立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并任命私人智囊为正式机构成员,以期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更好地转化为实际政策。

进入 90 年代后,小泽一郎在其著作《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建立“首相名副其实地在位并领导政治”的新体制,提议建立“首相助理官制度”。^②1996 年上台的桥本龙太郎则提出了强化首相官邸功能的具体方案,以“排除纵向行政的割据主义弊端,实现行政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并强化官邸的领导”。^③这一改革最终于 2001 年森喜朗内阁时期完成。经过此次改革,在组织机构上,内阁官房中新建了三个官房副长官助理职位以取代“各自为政”的政策室,并设立了五名首相助理;在具体职能上,内阁官房的权限通过修改《内阁法》得以加强。此外,“经济财政咨询会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等战略性咨询机构分别对应相关省厅,使首相能够及时获取和集中各省厅的信息,为增强首相决策能力提供了保证。

在小泉内阁时期,得益于桥本行政改革对官僚权力的限制以及小泉个人破除自民党内派阀政治的决心,决策权力进一步向首相官邸集中,“自上而下”的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得到了极大发展。首先,小泉内阁进一步推进行政改革,通过扩充内阁官房的人员构成以增强首相权力;其次,小泉内阁强化了直属于首相的咨询机构的职能,隶属于内阁府的“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取代中央省厅和自民党内决策机构成为经济决策中心,首相官邸得以主导财政运营和经济改革;最后,首相官邸主导模式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实现了有效运行,2001 年的《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和 2003 年的《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都在首相官邸的主导下以较快的速度形成法律。

小泉下台后,强化首相官邸决策权力的步伐有所放缓,民主党执政时期以实现“政治主导”为目标的决策体制改革也遭遇挫折,直至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才重新得以迅速发展。再度执政后,安倍晋三通过内阁官房、首相私人咨询机构以及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首相领导下的机构进一步左右决策制定。此外,他任用与其私人关系密切的官僚并设立内阁人事局进一步整合官僚力量,确保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的落实和畅通。安倍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呈现出制度化和个人化的趋势,安倍个人的政治意图和理念通过这些机构更为直接地体现在政府政策之中。在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安倍首相官邸不仅主导了日本诸多战略和政策的出台,更大大加速了日本改变战后体制的进程。

二、安倍内阁历史观问题的决策影响因素

作为一个有着鲜明立场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安倍晋三对历史观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2012 年 12 月再次就任首相之后,安倍牢牢掌控了历史观相关议题的决策主导权,诸多因素都对安倍的判断和决策形成了程度不一的影响。

(一)安倍晋三个人的历史观

作为政治决策过程的核心,安倍晋三个人的历史观直接影响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出身于政治“豪门”的安倍自幼深受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步入政坛后更是奉小泉纯一郎为“政治导师”,因此,他的个人政治思想观念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并以改变战后体制、实现日本的“复兴”为己任。1993年,安倍首次当选国会议员,自此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而他的右倾历史观在随后便初现端倪。1997年,安倍与中川昭一等人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后改为“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议员会”),以推动修改带有所谓“自虐史观”的历史教科书,为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翻案”。2001年,安倍向日本放送协会(NHK)施压,要求其修改报道慰安妇问题的节目内容。^④此外,安倍极力支持小泉的参拜行为,并在未担任首相时多次以自民党干事长、官房长官等身份前去参拜。对于靖国神社问题,安倍在其专著中详尽阐明了自己的立场,认为“首相怀着理所当然的心态去参拜靖国神社,而国民静静地守护它,我认为这才是最正确的态度”。^⑤具体来说,关于首相违宪论,他认为1977年“津地镇祭诉讼”一案中“国家机构出于社会习惯和礼仪进行的活动不是宗教活动”的“合宪”判决为首相参拜提供了合法性,“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符合宪法的,这应是业已形成的定论了”;^⑥关于合祀于靖国神社之中的甲级战犯,他坚称“在国际法中,根据事后法进行的裁判是无效的”,^⑦“甲级战犯不是日本国内法意义上的战犯……如果国家放弃表彰这些人,那么谁还会愿意为国家流血流汗呢”;^⑧关于靖国神社问题引发的外交争议,安倍则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日本的立场不改变,中国迟早会做出让步。至今为止,日本首相并未在此问题上提出要求,中国的行为太过分了”。^⑨

虽然安倍在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出于现实考虑在历史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但在再次上台之后,安倍的立场展露无遗,日本政府也在相关问题上频频表现出否认历史的态度。上任伊始,安倍及其阁僚便对修改“村山谈话”、“河野谈话”多次放风试探。2013年12月26日,安倍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2014年8月《朝日新闻》误报慰安妇事件发生之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表现出更为强硬的立场,公开否认“河野谈话”,并对联合国报告以及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涉及慰安妇的内容提出修改要求。而针对将于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发表的首相谈话,安倍则暗示将修改“村山谈话”的部分关键措辞,突出“安倍政府的看法”。^⑩这些言论和行动的根本驱动力都是安倍个人带有右倾色彩的历史观。

(二)负责协助首相的安倍智囊团与“安倍团队”

上任后,安倍召集了一批与其政治理念相近的智囊,并成立了相应的私人咨询机构,这些智囊对安倍历史观问题决策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第一次安倍内阁时期,来自学术界的智囊“保守五人组”为安倍的决策提供了较多的智力支持,成员包括日本政策研究中心所长伊藤哲夫、东京基督教大学教授西冈力、福井县立大学教授岛田洋一、高崎经济大学教授八木秀次和京都大学教授中西辉正。2006年6月,这五位带有右倾立场的学者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为安倍出谋划策,而安倍之后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暧昧战术”正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⑪重新上台后,安倍也就关于历史认识的首相谈话问题寻求智囊的辅助。2015年2月25日,以协助安倍起草首相谈话为目的的“21世纪构想恳谈会”正式召开,该会议将“思考能成为谈话素材的内容”,以“主导权在首相手中”为前提开展工作。^⑫参加恳谈会的16名专家中除了中西辉正之外,还包括主张修改“河野谈话”的日本防卫大学名誉教授西原正和持“自卫战争史观”的GLOBIS集团主席堀义人等人。

在内阁人事安排上,安倍曾因过于偏重于亲信而广受批评,第一次安倍内阁也被外界揶揄为“朋友内阁”。第二次组阁时,为了摆脱这一形象,安倍邀请了麻生太郎、谷垣禎一、石原伸晃等党内“重量级人物”入阁,18名内阁成员中共有八位拥有入阁经验。然而,此次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仍与安倍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首相官邸中的官僚更以安倍的亲信为主,他们组成了新的“安倍团队”。在历史观问题上,“安倍团队”成员多为保守主义政治家,甚至有评论家将此次内阁称为“愤青内阁”、“过度喧闹的极右内阁”,^⑬从其参与保守议员联盟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历史观立场也可见一斑(表1)。这个与安倍在历史观问题上立场相近的“安倍团队”在其决策过程中扮演着建言者、探路者和维护者的角色。当然,安倍团队中的“务实派”如官房长官菅义伟等人,也会考量多方面因素,在历史观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提议安倍保持克制,为他的过激的右倾主张“踩刹车”。^⑭可以说,安倍智囊团和“安倍团队”通过向安倍提供意见与支持,影响着安倍的历史观及其决策,而他们的保守主义立场也与安倍在历史观问题决策中的右倾态度呈相辅相成之势。

表1 第二次安倍改造内阁(2014年9月3日-2014年12月24日)保守议员联盟一览^⑮

	大臣		首相辅佐官	官房副长官	副大臣	政务官	合计	
日本议联	16	84.2%	3	2	11	10	42	55.3%
教科书议联	10	52.6%	2		2		14	18.4%
神道议联	18	94.7%	3	2	16	21	60	79.0%
靖国议联	16	84.2%	3	2	17	16	54	71.1%
改宪议联	13	68.4%	3		4		20	26.3%
同盟议联	6	31.6%	3	2	8	5	24	31.6%
创生“日本”	8	42.1%	3	2	7	6	26	34.2%

注:大臣19人,首相辅佐官3人,官房副长官2人,副大臣25人,政务官27人,共计76人。

数据来源:俵義文「第2次安倍晋三改造内閣の超タカ派の大臣たち」,http://chikyuzo.net/archives/47595。

(三)国内舆论与他国态度

在首相官邸主导型的决策模式下,历史观相关问题的决策过程都在首相官邸内进行,首相掌控着决策的基本方向,但其掌控力也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外部因素有时甚至会对首相的决策起到阻碍的作用,使其不得不做出妥协。对于安倍内阁而言,由于在政治层面上来自党内和在野党的制衡力量弱小,影响其历史观问题决策的外部因素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国内舆论和中国、美国和韩国等国家的态度。

在国内,舆论的走向会反映在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之上,进而左右选举的结果,因此安倍在决策时必然会受到民意及媒体的影响。此外,由于安倍的右倾历史观在党内代表着主流立场,且反对其历史观的在野党的支持率在近年来持续低迷,党内外的反对力量难以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对安倍决策的影响,所以他们也更多地选择诉诸媒体,通过引导舆论为安倍制造压力。在国际社会上,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和韩国在历史观问题上对日一直持警惕态度,安倍在进行决策时也需要考虑中韩两国的反应以及对外交关系的影响,安倍在第一次内阁时放弃参拜靖国神社正是出于修复与中韩关系的考量。另外,鉴于日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的态度无疑是安倍内阁在历史观问题决策中优先考虑的因素之一。2007年3月,时任首相的安倍曾表示“没有证据证明日军曾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这一发言在国际社会掀起波澜,也

受到美国政府及国会的强烈批评。在这一压力下,安倍不得不改变态度,于4月访美期间就慰安妇问题两度进行道歉,表示“对她们的苦难经历深表歉意”,以防止日美关系继续受该问题影响。^⑩

三、案例分析:2013年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的决策过程

2013年12月26日,安倍在其第二次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行为在日本国内遭到了诸多反对,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右倾化行为的批评和担忧。不仅中国和韩国对日本表示强烈抗议与严厉谴责,美国政府也罕见地发表了对其“表示失望”的声明。事实上,安倍甘冒巨大的外交风险做出这一参拜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历了一个自上任之时起即已开始的决策过程。据安倍的亲信、内阁官房参与饭岛勋透露,在2013年12月26日之前,安倍曾两次考虑过进行参拜,分别为2012年12月重新就任首相的次日和2013年10月的秋季例行大祭期间。^⑪通过对这三个关键时间点之间事实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大致展现出在多方因素影响下的安倍的决策逻辑。

(一)第一个阶段:2012年12月27日前后

早在2012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竞选活动中,安倍便表示为第一次担任首相期间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感到“痛恨至极”,表示出将进行参拜的意向。^⑫获胜后,安倍于10月17日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在12月17日众议院选举胜选记者会上,安倍再次对2007年未能参拜靖国神社表达悔恨之意,当天还有媒体报道称,安倍身边人士称其“要参拜的话将在明年秋天”。^⑬这两次表态被“日本遗族会”等保守派支持者视作安倍在当选首相后会参拜靖国神社的“承诺”。12月26日,第二次安倍内阁正式成立。

事实上,安倍是否应于次日“闪电参拜”靖国神社的讨论一直在首相官邸内进行。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和内阁官房参与饭岛勋向安倍提议于27日上午进行参拜,认为首相应拒绝承诺不参拜靖国神社,但官房长官菅义伟和首席首相秘书官则以经济为优先考虑并顾虑到反对首相参拜的舆论,因而反对安倍此时参拜靖国神社,今井尚哉更是表示“会拼尽全力来阻止”。^⑭在新成立的第二次安倍内阁中,阁僚们在首相是否应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同样存在分歧。石破茂、谷垣禎一、石原伸晃等人对此一直持谨慎态度,石破茂在9月的自民党总裁竞选中再次表明其坚持已久的“分祀论”的主张,即通过分祀甲级战犯而“实现天皇再次‘亲拜’”,石原伸晃在此问题上也表明了相似的立场;^⑮而麻生太郎、古屋圭司、稻田朋美、新藤义孝等政治立场偏右的内阁成员则对参拜靖国神社持支持态度。

当时,从国内形势来看,安倍率领的自民党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超过半数席次的294席,与公明党再次组成联盟以压倒性优势再次执政。同时,民意调查也显示,对自民党重新夺回政权持肯定态度的民众占58%,持反对态度的民众只占28%。^⑯对于安倍而言,他无疑希望保持这种较高的支持率,并将政策重心更多地放在民众更为关注的经济、社会及外交等问题上,贸然进行“闪电参拜”可能会对其支持率带来负面影响。从国际局势来看,面对在野田内阁时期陷入低谷的日中与日韩关系,安倍在众议院竞选承诺中明确提出要改善与中韩的关系。胜选后,安倍先是拟定于正式就任首相之后派遣特使访问两国,后更是表示希望借特使向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递交亲笔信以改善日韩关系。^⑰另外,安倍也将强化日美同盟作为任内的外交优先课题,并正在计划于2014年1月访问美国。因此,选择在新内阁成立次日

参拜靖国神社必然会打乱安倍的外交布局。最终,在这样的国内外局势下,尤其是“因考虑到周边局势,(安倍)打消了参拜念头”。^②

(二)第二阶段:2013年初——2013年10月

在2013年上半年,外界所关注的安倍可能参拜的时机有两个,即4月的春季例行大祭和8月15日的“终战日”。对于春季大祭参拜的可能性,2012年12月就有报道称安倍将不参加来年春季的例行参拜活动。^③3月29日,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安倍决定不会于春季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7月,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大胜,安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言辞闪烁、继续采取“暧昧战术”,安倍是否会于8月15日参拜转而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但这个时间仍没有被安倍本人作为适合的时机进行考虑,8月7日,安倍正式宣布将不会于15日参拜靖国神社。

在安倍放弃于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之后,他表达出在秋季大祭进行参拜的意向,是否于是时进行参拜的决策随即开始。首相官邸内,卫藤晟一、饭岛勋等保守派和菅义伟、内阁官房参与谷内正太郎等“务实派”的意见再次出现对立,菅义伟仍坚持认为参拜靖国神社将会使日本与中韩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④在8月前后,内阁成员也在靖国神社问题上频繁表态。继于4月参拜靖国神社并导致日本与中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之后,麻生太郎在7月29日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不向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们表示敬意和感谢才是反常的”,首相“静静地参拜就可以了”。^⑤8月2日,石破茂在其发表于个人网站的一篇文章中则再次强调“分祀”的必要,并指出对参拜的国际影响和对日本国际地位的考虑是“政治家理所当然的职责”。^⑥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则在8月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参拜靖国神社是与个人的心灵相关的问题”。^⑦

此时,影响安倍首相官邸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安倍大力推动的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相关法案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将在秋季的临时国会上进行表决,在此之前参拜靖国神社可能刺激反对力量和多次要求安倍避免参拜靖国神社的执政盟友公明党,使法案的通过受阻,此外,10月初关东地区的台风灾害也使得首相官邸“需集中精力于危机管理的事务上”。^⑧其次,虽然日本与中韩两国改善关系的进程在这半年多以来并无明显进展,但安倍内阁仍有意进一步推进,日本外务省也向安倍表示中日之间“可能于年内达成首脑会谈的共识”,^⑨安倍则于10月初参加APEC峰会期间多次表示希望同中韩领导人对话,而不参拜靖国神社则被其视作实现首脑会谈的一个“筹码”。最后,美国在该时期频繁表示希望安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在8月15日之前,美国就开始向安倍传递希望其不要参拜靖国神社的讯息。7月26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新加坡与安倍进行会谈时要求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美国国会研究所则于8月2日发布一份报告称,安倍或其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可能会激化地区紧张局势,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⑩10月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访日期间专程造访千鸟渊战歿者公墓献花,这也被认为是在对安倍5月访美期间将靖国神社与美国阿灵顿公墓相类比的言论表示反对。^⑪在这之后,11日,安倍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表示不会透露是否参拜;12日,有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称安倍将不会参拜;^⑫17日,安倍未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仅是与春季大祭一样供奉祭品。

(三)第三阶段:2013年10月——2013年12月26日

在10月中旬安倍决定不会在秋季大祭期间参拜靖国神社的前后,他“于年内一定进行参拜”的意图已经开始形成。^⑬对安倍而言,参拜靖国神社既是他向保守派支持者作出的承

诺,也是他个人的夙愿,不宜继续拖延。卫藤等人也积极建议安倍于执政一周年之际履行其“诺言”,以免引起保守阵营的不满。此外,卫藤还向安倍进言称,2014年4月奥巴马将访问日本,同年秋将在北京召开APEC会议,2015年春天还将举行日本统一地方选举,因此年末是参拜的最好时机。^③10月20日,安倍的亲信、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萩生田光一向媒体透露安倍考虑在12月底前参拜靖国神社。但之后,首相官邸再无行动表达安倍的参拜意愿。11月,安倍在官邸会见韩国驻日大使时仍向韩方彰显自己对于对话的积极姿态。进入12月以后,一些媒体如时事通信社、共同社也逐渐倾向于认为安倍可能将再一次放弃参拜,《每日新闻》则在安倍参拜前一天的25日刊文称首相将放弃于年内参拜。^④

事实上,首相官邸关于安倍是否应于12月26日参拜的讨论一直持续到25日夜里。^⑤此时的国内外局势与两个月前相比已发生了一定变化。在国内事务上,赢得了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自民党政权已经进入了平稳运营期,且安倍在这一年间推动的重要法案均得以通过。该月上旬的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约为55%左右,虽然这一支持率受《特定秘密保护法》通过的影响为其第二次组阁以来的最低点,但仍保持在50%以上的较高水平,并远远高于民主党(6%)、维新会(2%)等在野党。^⑥在国际层面上,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关系持续处于低谷,关于首脑会谈的磋商仍未取得进展,中国于11月23日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一事也使安倍内阁对中国更为不满。另外,安倍在之前几次时机放弃参拜的行为并未换得与中韩关系的缓和,两国仍对其供奉祭品和允许阁僚参拜进行了猛烈的批评,饭岛勋也向安倍进言称,“即使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与中韩的关系也业已处于最坏的情况”。^⑦在对美关系上,虽然卫藤晟一于11月20日秘密访美期间所获得的讯息是美国仍不希望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但安倍于12月25日会见冲绳县知事仲井真弘多,与其在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达成了协议,使影响日美关系的一大阻碍因素得以解决,日美关系由此向前更迈进一步。安倍也由此对美国在该问题上的可能反应持乐观态度,甚至在26日上午在与石破茂通话时表示:“(参拜)已经取得美国的谅解”。^⑧最终,12月26日11时30分,安倍实现了参拜靖国神社。

通过对上述三个时间段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决策过程中,各相关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表2)。首先,国内舆论和他国态度这一官邸外部因素对安倍参拜时机的选择产生了关键性影响。在安倍内阁的决策过程中,所有判断的依据都需要建立在当前国内外局势和其走向上,在春季大祭、战败纪念日 and 秋季大祭放弃参拜的决定都是受当时的国内舆论尤其是中国、韩国和美国给予的压力而做出的,而安倍也通过不断在各方之

表2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决策影响因素在各时间段内的具体情况

	安倍个人	内阁及智囊	国内因素	国际因素	
				中韩	美国
2012年12月27日前后	有意参拜,考虑时机	意见存在分歧	新内阁刚刚成立,需保持高支持率	有意修复此前受损的中日、韩日关系	希望将首访定于美国
2013年初至2013年10月			“国安会”相关法案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即将于国会进行表决	中日间首脑会谈仍有实现可能	美国就靖国神社问题多次表示反对态度
2013年10月至2013年12月26日			政权进入平稳运营期	与中韩关系短期内无好转迹象	普天间问题取得重大进展

间寻求平衡来决定最佳的参拜时机。其次,安倍的智囊和亲信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首相官邸内,他们通过建言献策向安倍的决策施加影响,也作为首相特使参与外交斡旋,承担了外务省官僚的部分职责,使安倍能够更高效、直接地与他国政府进行沟通;另外,他们还是首相官邸向外发布消息的重要渠道,通过向不时媒体“泄露”消息配合安倍在参拜问题上的“暧昧战术”。最后,安倍个人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与小泉不同,安倍参拜靖国神社除了出于政治考量之外,更多地还是由于个人的保守主义思想立场,在决策过程中对智囊和亲信的重用也体现了他希望为政策注入更多的个人色彩,而当面临首相官邸内的意见分歧和外部态度的难以揣测时,安倍则体现出了一中强势领导人所拥有的决策力。

四、结 论

对于易被内阁频繁更迭、政治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困扰的日本而言,安倍晋三作为“强势首相”的上台无疑对当前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和发展起到了加速的作用,这与他通过首相官邸来对政治决策过程的主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决策模式上,安倍在汲取民主党政权变革官关系受挫的教训的同时,大力推动决策主导权向首相官邸的转移。而且,这一时期在历史观问题上的首相官邸主导模式更进一步凸显了“安倍风格”,他的个人立场与政治考量通过私人咨询机构和“安倍团队”成员对决策直接施以影响,并最终决定政策的制定出台,这在他参拜靖国神社的决策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15年8月15日,日本将迎来战败70周年,安倍届时将发表的首相讲话成为安倍内阁面临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观问题决策,在这一过程中,“安倍风格”的首相官邸主导型模式值得继续关注。

注 释:

①参见徐万胜:《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5期;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外交评论》,2014年第3期。

②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③戴晓亮、胡令远编:《日本式经济、政治、社会体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

④「NHK「慰安婦」番組改変 中川昭・安倍氏「内容偏り」前日、幹部呼び指摘」、『朝日新聞』、2005年1月12日。

⑤安倍晋三、岡崎久彦『この国を守る決意』、扶桑社、2004年、145頁。

⑥同上、144頁。

⑦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年、69頁。

⑧安倍晋三、岡崎久彦『この国を守る決意』、149-150頁。

⑨同上、144頁。

⑩《安倍暗示修改“村山谈话”,回避“侵略”等字眼》,新华网,2015年1月26日。

⑪「「安倍氏ブレーン」どんな人?」、『東京新聞』、2006年9月9日。

⑫「70年談話、夏までに報告書 有識者会議 首相、論点5つ提示」、『産経新聞』、2015年2月26日。

⑬「新政権はどんな政権? 辛口識者に命名してもらいました」、『東京新聞』、2012年12月27日。

⑭「安倍政権は右傾化しない—側近や公明党が「現実路線」に修正」、『選抜』、2013年1月号、55頁。

⑮该表格统计的主要保守议员联盟包括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的后援团体“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日本会议议联”)、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委员会”(“教科书议联”)、宣扬神道思想和国家主义的“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神道议联”)、维护靖国神社的“大家一起来参拜靖国神

社议员联盟”以及主张修宪的“宪法调查推进议员联盟”(“同盟议联”)、“新宪法制定议员同盟”(“同盟议联”)和“创生‘日本’”等。

- ①⑥「安倍総理と米国連邦議会議員との会談」、日本外務省、2007年4月26日。
- ①⑦“Abe Aide Explains Thinking Behind Yasukuni Visi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8, 2014.
- ①⑧「河野談話、靖国、尖閣で各候補の違い浮き彫り」、『産経新聞』、2012年9月14日。
- ①⑨「日媒：安倍或在出任首相后参拜靖国神社」、参考消息网、2012年12月19日。
- ②⑩赤坂太郎「靖国参拜、知られざる官邸の暗闘」、『文藝春秋』WEB、2014年2月10日。
- ②⑪参见视频资料「自民党総裁選共同記者会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q-VksENTXQ>
- ②⑫「自民政権復帰「好ましい」58%…読売世論調査」、『読売新聞』、2012年12月19日。
- ②⑬《安倍给韩国女总统写亲笔信》，环球网、2012年12月22日。
- ②⑭「安倍首相、きょう靖国参拜 政権1年、就任後初」、『産経新聞』、2013年12月26日。
- ②⑮「尖閣・竹島も慎重…安倍氏、靖国参拜見送り意向」、『読売新聞』、2012年12月23日。
- ②⑯「三度目で決断した安倍首相 366日目の靖国参拜」、『日経新聞』、2013年12月27日。
- ②⑰参见日本国家基本问题研究所(JINF)网站演讲视频「日本再建への道」、<http://jinfp.jp/movie?id=11440>。
- ②⑱石破茂「夏、歴史、靖国など」、石破茂オフィシャルサイト、2013年8月2日。
- ②⑲参见视频资料「【動画】総務大臣 記者会見(2013年8月15日)」、新藤義孝公式ウェブサイト。
- ③⑩「三度目で決断した安倍首相 366日目の靖国参拜」、『日経新聞』、2013年12月27日。
- ③⑪「靖国参拜を巡り、試される首相の忍耐力」、『中央公論』、2013年12月28日。
- ③⑫「首相参拜なら緊張激化と米調査局 国益への影響懸念」、共同通信、2013年8月3日。
- ③⑬「米国務長官らが千鳥ヶ淵墓苑で献花」、AFPBB News、2013年10月3日。
- ③⑭「安倍首相、靖国参拜見送り強まる 中韓改善へ布石」、共同通信、2013年10月12日。
- ③⑮「10月決断、「年内に…」米中韓関係見極め「空白」断つ」、『産経新聞』、2013年12月27日。
- ③⑯赤坂太郎「靖国参拜、知られざる官邸の暗闘」、『文藝春秋』WEB、2014年2月10日。
- ③⑰「靖国参拜、年内見送りの公算＝対中韓関係を考慮－安倍首相」、時事通信、2013年12月21日；「安倍首相、年内参拜見送り 靖国神社 外交への影響考慮か」、『毎日新聞』、2013年12月25日；《安倍年末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备受关注》，新华网、2013年12月23日。
- ③⑱「安倍首相、きょう靖国参拜 政権1年、就任後初」、『産経新聞』、2013年12月26日。
- ③⑲「内閣支持率、55%に下落…不支持38%に上昇」、『読売新聞』、2013年12月9日。
- ④⑩「三度目で決断した安倍首相 366日目の靖国参拜」、『日経新聞』、2013年12月27日。
- ④⑪「「右傾化暴走」安倍が掘る墓穴」、『選択』、2014年3月号、51頁。

(黄贝: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亚太地区的权力变迁与日本的战略困境

邹应猛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引发了亚太地区的权力变迁。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使其成为地区经济权力中心,但美国仍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日本由于国内经济的低迷和社会问题,逐步走向衰落。在这种新的权力格局中,作为守成国家的日本对中国和美国存在着不对称的依赖关系。日本的这种位置,使得无论中美关系如何变化,其在美国的东亚战略地位都面临着下降的风险。这由此也使日本在对外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

关键词 权力变迁 中美日三边关系 日本对外战略

冷战期间,日本与美国在应对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这一共同威胁之下结盟,在安全上获得保障,并将战略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成为“贸易国家”。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事实上也加入了这一反苏阵营。中国、美国、日本在冷战期间就围绕着应对苏联阵营的威胁而形成了“统一战线”。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这一共同威胁不复存在,削弱了美日同盟的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的崛起引发亚太地区的权力变迁,使中美日三边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中美日这一组三边关系在日本对外关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从经济上看,美国、中国、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而且,中国和美国构成了日本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其次,在安全上美国仍然是日本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保障。但与此同时,与中国在钓鱼岛和东海等问题上存在的领土领海争端,是日本必须妥善处理 and 解决的问题。在经济上,日本对中国的依赖不断上升,这使日本必须管控与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和潜在冲突,避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受到不良影响。这种新的环境下,在中美日这一组三边关系中,日本在外交战略上将可能越来越陷入困境。

一、亚太地区的权力变迁

冷战期间的相当长时间内,东亚地区是以美国为轴心、其东亚盟友为轮辐的轴辐架构。在这种轴辐架构中,美国以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居于支配地位,而日本则实行吉田主义,专注于经济发展。在安全上,日本通过美日同盟获得安全保障,并与中国建立和发展了稳定的良好外交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的权力变迁,逐步改变了这种地区架构。

1. 中国崛起为东亚地区经济大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亚国家将重心逐步转移到发展经济上,冷战的结束进一步加快了东亚经济的发展。这使得世界经济中心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中国经济在

这一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在 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就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与美国之间还存在巨大差距,但中国的经济崛起足以影响东亚地区经济的运行。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远快于美国。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 20 多年时间内,中国经济连续保持了 10%以上的增长速度,而同期美国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2.7%。^①经济学家阿文德·苏巴马莲(Arvind Subramanian)断言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并预测到 2030 年中国 GDP 将占到全世界 GDP 总值的 20%,而同期美国所占比重则可能低于 15%。^②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高了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在 1997 年东亚经济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立场,为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推动地区经济复苏起了重要作用。同样,在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投资在拉动世界和地区经济复苏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③

其次,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网络的中心,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东亚内部来看,中国的崛起之后,东亚地区生产网络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经济网络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④

第三,中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主要行为体的重要贸易伙伴,在商品货物流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是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在美国的五个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里,中国是除菲律宾外其他四国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在 2009 年成为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还是东盟最重要的投资和援助来源国。此外,中国早已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⑤

总之,中国在东亚经济领域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并成为影响东亚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东亚各行为体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日益增加,对美国 and 日本的依赖正在降低。不仅如此,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在经济领域也正形成日益紧密的相互依赖。

2. 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事务中仍然处于优势地位

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无疑处于优势位置。这种优势位置从两国军事力量对比、与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以及所受到的限制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美国是东亚地区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军费开支基本上保持在 GDP 的 4%左右,而同期中国的军费开支仅占 GDP 的 2%。考虑到中美之间在 GDP 总量上的差异,这种军费开支的差异就非常明显了。除了这种硬实力的差异,在军事领域的“软实力”方面的差异也非常明显。美国不仅在军事科技水平方面领先,而且冷战结束后先后参与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战争,并每年与东亚地区多个国家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实战能力。相比之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军队除了参加多边维和行动和与地区内一些行为体展开少量的联合军演之外,基本上没有参与过战争。

第二,美国通过维持轴辐安全体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来扩大合作范围,试图继续维持地区安全合作的中心地位。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轴辐同盟体系仍然存在,并出现不断深化的趋势。除了美日和美韩同盟,美国还与东亚地区的菲律宾、新西兰、泰国以及东亚周边的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保持着长期军事伙伴关系。

与此相对,中国在东亚及其周边只有与朝鲜的同盟关系以及中巴“全天候伙伴关系”。除此之外,中国和俄罗斯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尽管在安全领域存在着合作,但其基础建立

在双边伙伴关系之上,在军事领域的合作程度远无法与同盟关系相比。

第三,美国以“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介入东亚地区安全合作,降低了东亚行为体的疑虑。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曾指出,“美国是唯一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盟友、没有领土野心且长期向区域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国家。”沃尔特的威胁制衡理论也认为地理位置的邻近构成了行为体判断威胁的来源之一。^⑥这种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得美国得以有选择地介入东亚地区内事务,降低了地区行为体的疑虑。因此,美国常被视为维持东亚地区稳定的关键力量。^⑦

与美国的超脱相比,中国在安全领域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区内部的制约。首先,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至今存在着领土、领海纠纷。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和东海问题,与一些东盟国家存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与印度存在陆地边界上的争端,等等。这些纠纷因为历史因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地缘政治因素,往往持久得不到解决,影响了中国与这些国家间建立互信,并常常成为诱发双边和地区冲突的因素。不仅如此,中国尚未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台湾与大陆的分裂这一冷战遗产,被美国用来作为遏制中国的抓手,制约着中国在地区范围内的影响力。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事务中仍然处于优势地位。美国不仅在自身的军事实力方面远超中国,而且在动用地区安全资源、摆脱地区安全困境束缚等方面同样具有优势。而在东亚地区经济领域,美国的影响力显然在不断下降,并被中国超越。相比美国,中国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速度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正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这种经济上的联系在中国与地区内其他行为体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

3. 日本走向衰落的风险增大

相比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和美国在军事领域的优势地位,日本自冷战结束以来却经历了持续的衰退。日本的衰退首先表现在经济领域。经济实力被认为是影响一国战略地位的重要因素。日本在二战结束之后推行吉田主义,专注于经济发展,使其在相当长时间内在东亚地区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冷战结束之初,日本还被视为将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支配地位。亨廷顿认为日本的经济权力为日本对外战略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为日本提供了获得和研发重要军事技术的能力,而且赋予日本使用各种经济手段作为外交工具的能力,诸如制裁和对外援助,从而提升其国际影响力。^⑧

近年来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使其凭借经济优势获取的战略资源逐渐减少。冷战结束之后,日本经历了连续两个“失去的10年”,国内面临的通货紧缩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至今尚未走出困境。日本深陷债务危机,国内公共债务占GDP比重接近250%,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为严重的国家。^⑨而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也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渣打银行201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日本经济总量在2030年将被印尼超过,届时将退出世界五大主要经济体行列。^⑩

其次,日本的国内社会问题尤其是人口问题是削弱日本国际战略地位的又一因素。人口被视为影响一国综合实力和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自2005年开始日本的人口规模开始缩小,人口增长率出现不可逆的下降。最近有报告指出,日本人口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内减少30%,这将使日本人口下降到世界第18位。而日本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同时出现,又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有学者研究指出,人口的下降和平均年龄的上升将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在未来的30到50年内,即使生育率大量提高,当前的低生育率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劳动力匮

乏的局面。^①

经济的低迷和人口问题,至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影响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首先,经济的低迷直接影响日本的军事能力。面临国内的经济萧条,日本已经连续 10 多年调低防务预算,这种趋势直到最近才开始逆转。^②其次,这些社会问题进一步限制了日本的经济增长,限制了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战略选择。例如,日本劳动力的减少将增加劳动成本并削弱政府的税收基础。同时,政府还面临着与此相关的医疗健康等公共服务问题和财政支出困境。日本的人口问题,不仅限制了其摆脱经济低迷的政策选择,而且还会降低其在诸如国际贸易、气候谈判、地区一体化合作等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

二、日本对中美两国的结构性不对称依赖

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的权力变迁使日本与中国、美国等地区 and 全球大国形成了结构性的不对称依赖关系。一方面,日本试图通过继续保持美日同盟来获得安全保障,另一方面日本又需要利用崛起的中国来改善自身的经济环境,以缓解本国地位不断下降所带来的经济挑战。正是这一情景,影响了日本的对外战略选择。

1. 美日同盟与日本面临的困境

美日同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苏联共产主义阵营的需要。但冷战结束后这一共同威胁消失,美日同盟并没有解体,相反在一些领域的合作出现了加强的趋势。由此产生一个问题,美日同盟对于冷战结束后的日本而言,有何意义?

首先,“留住美国”是日本寻求与更多国家“结伴”的需要。冷战期间日本在美国轴辐安全体系下,与东亚的韩国、东盟国家通过战争赔偿以及援助等手段,建立和发展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从积极的意义来说,《美日安保条约》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兴起到了“瓶盖”的作用,限制或者威慑性地“锁定了”一些地区冲突。^③冷战结束后,出于对东亚权力真空的担心“留住”美国,缓解了日本邻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兴的担忧。中曾根康弘曾公开承认,美日同盟使得“美国可以监督日本的军事能力,这给我们亚洲邻国带来了一种安全感”。^④

其次,日本面临着国内和平宪法的束缚,为此需要美日同盟来应对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这一直为日本历任首相所强调。麻生太郎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日本自战后开始便以美国为重,强化同盟外交是一个绝对正确的选择。因为有了这一关系,亚洲才有和平的海洋,而在亚洲居住的人们才可称为了不起的贸易国。毫无疑问,这些安全保障都来自美国的军事力量,归功于日美同盟的存在。”^⑤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还将美日同盟视为维护地区稳定、建立地区秩序的基石。美国与日本在民主价值观、国家政治体系等方面的相似性,使日本将美国视为可信的盟友,认为双方在地区和全球秩序构建方面存在着共同利益。日本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完成对转型时期地区秩序的构建。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访问新加坡发表演说时指出:“在日本与东盟加强面向新世纪的合作关系时,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确保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毫不怀疑,支持这一前提条件最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日美安保协定对于保持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框架。所以我想借此机会明确日本将尽力对这一协定保持信心。我衷心希望这一安排的意义能够被正确理解。它是作为亚太地区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一种基础,没有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内容”。^⑥这一被称为“桥本主义”的演说,事实上不仅向外界

传递了日本对美日同盟的态度,而且阐释了美日同盟对于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尽管苏联这一威胁消失了,但日本仍然需要美日同盟来维护其安全利益。但是,冷战结束之后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美主日从的同盟关系已经给日本的对外战略带来了以下挑战:

第一,苏联的解体及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使美日同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日本面临着被美国“抛弃”或者“拖累”的风险。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与中国、印度、俄罗斯、东盟等日本周边国家之间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分歧,但整体上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趋于缓和,并无紧迫的安全威胁。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不存在类似苏联的敌人,使日本对美国继续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承诺的信心下降。^⑮

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之后,日本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美日之间很难再就寻找潜在的“敌人”问题上达成共识。换言之,美国的“敌人”可能并不是日本的“敌人”,甚至相反可能是日本的朋友。例如,在美国与伊朗的冲突中,伊朗是日本重要的石油供应国,这使得日本很难在制裁伊朗问题上追随美国。

第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东亚的霸权地位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地位不断降低,削弱了美国提供“公共物品”的意愿和能力,影响了美日同盟的可靠性。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美国未来可能无力或者不愿意采取行动以满足日本的直接安全需要。^⑯美国在东亚军事存在的可持续性也受到怀疑。日本2010年发布的《国家防务指南》注意到,美国“相对诸如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国家地位的下降”,表达出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担忧。^⑰

第三,日本维系美日同盟的成本不断提高。这一成本对日本对外战略的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商业集团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展;二是国内民族主义的复兴。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的推进,便利了日本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促使日本需要更为独立的对外政策来维护其海外利益,提升保护公民海外利益的能力。米尔顿·伊拉提(Milton Ezrati)指出:随着日本企业在亚洲不断扩大海外基地,为了确保这些企业的安全,日本需要更为积极的外交政策,这将与日本长期以来依靠美国来保护日本利益的做法相悖。^⑱

同时,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要求摆脱美日同盟、实现“正常”国家的呼声日高,给美日同盟也带来了变数。1995年日本发生美国士兵强奸日本女学生事件,引发日本民众对美日同盟的一次全国性的质疑。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1998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要求以美军撤出日本为前提重建美日同盟。这些正是日本民族主义上升的体现。

2. 中国的崛起与中日之间的不对称依赖

对华战略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之后这一双边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安全等三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政治方面。中国的崛起以及影响力的扩大,使日本担心被中国排挤出东亚地区。日本在冷战期间通过对东盟国家的援助以及在经济上的合作形成的“特殊关系”,面临着被中国日益提升的影响力所削弱的风险。^⑲日本认为中国正在通过传播本国文化和“北京共识”来增强“软实力”,从而谋求在东亚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

其次,日本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也受到中国的挑战。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并通过开放的经济体系参与东亚生产网络,逐步变成东亚生产网络的中枢。与此同时,日本在经济上对中国影响力逐步下降。

最后,在安全上,冷战之后地区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日本认为“朝鲜是日本当前的主要

威胁，而中国则是日本的长期安全威胁”。^②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的国防现代化引发日本的不安。日本尤其担心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影响其自由航行安全。

中国是在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明显的背景下崛起的。这就为中国不通过武力征服而是和平崛起提供了可能。中国意识到与外部其他行为体合作的重要性，坚持和平崛起的理念，营造了良好的地区和国际环境。中国通过“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改善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战略，积极融入了国际体系。日本也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获益。在这种背景下，将中国视为“不确定”而不是“威胁”，显然是更为明智的。因此，日本对待崛起的中国，选择了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方式，利用各种可能的机遇，并对冲可能面临的威胁。克里斯托夫·约翰斯通(Christopher Johnstone)用拳击比赛中的“钳住”(clinch)策略来比喻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对华战略。在拳击比赛中，为了防止拳击手相互之间产生实质性的伤害而抱成团。类似地，日本对中国的结伴策略表明日本试图“钳住”中国，从而限制了中国打击日本关键利益的能力。通过在中日之间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来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③

三、日本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困境

在变化的中、日、美这一组三边关系中，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冷战结束之后延续了下来，甚至出现不断强化的趋势。但是，日本对中国和美国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这一具体情景，使日本的对外战略越来越受到中美这一组关系的影响。无论中美之间关系的性质如何，日本的被动地位都难以改变。

(1)中美冲突与日本战略困境。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美日同盟保持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中国意识到美日同盟对约束日本军国主义复兴所扮演的角色，担心美日同盟的解体可能引发日本军事力量的扩张，带来地区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中国对美日同盟的增强同样保持戒心，尤其是美日同盟在1997年将防御范围由日本本土扩大到“周边海域”之后，加剧了中国对美日同盟的疑虑。

正是建立在中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竞争这一假设基础上，一些现实主义者将美日同盟视为遏制或者“塑造”中国未来战略走向的工具。但是，若从中美关系将走向竞争的视角来看，美日同盟的加强必将加剧中国与美国关系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对美国而言，一个地位处于下降中的日本，要应对正处于上升地位的中国的挑战，显然不是可靠的盟友。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可能无法有效地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④正是出于这种疑虑，美国加强了与韩国、印度、印尼等国家的合作。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将下降。

(2)中美合作与日本战略困境。有学者认为中国毕竟不是前苏联，中国的崛起建立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的国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中美之间形成的紧密依赖关系和日益增多的全球共同利益，将使中美最终走上合作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地位的相对下降，日本在中美合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被边缘化。有学者指出，当中美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时，日本将变成美国“有限的可靠伙伴”(limited liability partner)。^⑤

总之，在与中美这两个大国打交道时，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都面临着下降的威胁(图1)。考虑到当前日本对美国在安全领域、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不对称依赖，日本在这组

三边关系中正面临着日益增加的脆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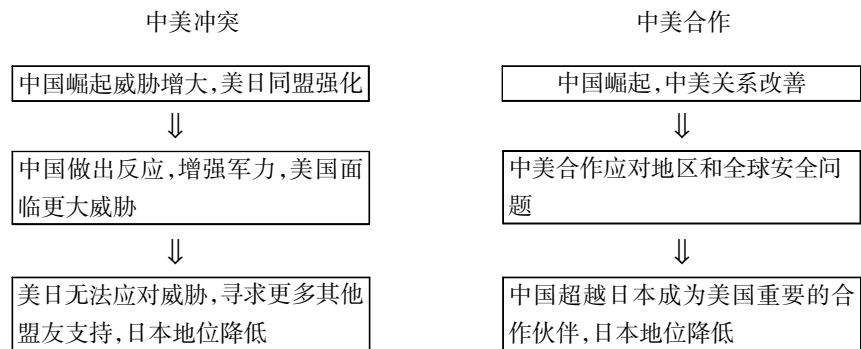


图 1 中美关系与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日本尽管与美国通过伙伴关系巩固了美日同盟,通过中日伙伴关系“钳住”了中国。但是,由于日本实力的不断下降,使得日本在美国的东亚战略中的地位面临着下降的风险,这大大削弱了其在后冷战时代应对“威胁三角”问题的能力。

四、结 语

冷战结束之后,亚太地区的权力变迁使得中美日三边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崛起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美国仍然在军事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而日本由于经济的持续低迷以及国内社会问题尤其是人口问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和对美国在安全上的依赖也在不断深化,而这种依赖关系又是不对称的。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Hughes)指出,随着日本相对低位的下降,美日同盟将变得不再牢固。因此,日本需要通过发展包括与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来弥补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⑤但另一方面,日本由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之间在历史问题、领土领海争端等议题上悬而未决,彼此又无法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作为东亚守成大国的日本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

注 释:

①World Bank data,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ZG>.
②A. Subramanian, “The Inevitable Superpower: Why China’s Dominance is a Sure Thing,”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5, 2011, pp.66-78.
③“Roundtable China’s Surrounding Security Environment,” *China Review*, March 2011, pp.53-67.
④A. MacIntyre and B. Naughton, “The Decline of a Japan-Led Model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y,” in T.J. 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77 - 100.
⑤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 <http://countryrepor.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id=27876>.
⑥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⑦Y. F. Khong, “Coping with Strategic Uncertainty,” in Peter Katzenstein and Allen Carlson, eds.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72-208.

⑧S. P.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7, No.1,1993, pp.76 - 81.

⑨黄人杰:《日本主权债务问题探析》,《日本研究》,2015年第1期。

⑩Standard Chartered, *The Super-Cycle Report*, New York, 2010, p.21.

⑪B. Emmott, *Rivals: How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China, India and Japan Will Shape Our Next Decade*, Orlando, FL: Harcourt, 2008, p.97.

⑫M.J. Green, "Japan Must Resource Its New Defense Plan," *CogitAsia*, 14 Dec. 2010.

⑬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102页。

⑭P. Midford, "China Views the Revised US - Japan Guidelines: Popping the Cork?"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 - Pacific*, Vol.4, No.1, 2004, p.121.

⑮张智新:《麻生太郎执政后的日本政局及其对华政策》,《国际资料信息》,2008年第10期。

⑯桥本龙太郎:《为迎接新纪元进行改革——建立更深更广的日本—东盟伙伴关系》,新加坡,1997年1月14日。转引自邓仕超:《从敌对国到全面合作的伙伴——战后东盟—日本关系发展的轨迹》,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

⑰Y. Funabashi, "Tokyo's Depressio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77, No.6, 1998, pp.26-36; T.G. Carpenter, "Roiling Asia: US Coziness with China Upsets the Neighbors," *Foreign Affairs*, Vol.77, No.6, 1998, pp. 2-6.

⑱Y. Izumikawa, "Explaining Japanese Antimilitarism: Normative and Realist Constraints on Japan'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2, 2010, pp.123 - 160.

⑲D. Fouse, "Japan's 2010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 Coping with the 'Grey Zones'," *Asia-Pacific Papers*, The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1.

⑳M. Ezrati, "Japan's Aging Economics,"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3, 1997, p.101.

㉑D. L.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2004, pp.64-99.

㉒C. W.Hughes, "'Super-Sizing' the DPRK Threat: Japan's Evolving Military Posture and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49, No.2, pp.291-311.

㉓C. B. Johnstone, "Japan's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US-Japan Relations," *Asian Survey*, Vol.38, No. 11, 1998, p.1080.

㉔M. Finnegan, "Managing Unmet Expectations in the US - Japan Alliance," NBR Special Report 17, Seattle and Washington DC: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9, p.3.

㉕Ibid., p.20.

㉖C. W. Hughes,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s New (but Failing) Grand Security Strategy: from 'Reluctant Realism' to 'Resentful Realism'?"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 38, No.1,2012, pp.109-140.

(邹应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试析安倍政府积极和平主义战略 对中日战略互信的影响

马萧萧

内容提要 积极和平主义战略是安倍政府为日本发展制定的三步走战略,旨在恢复成为正常国家、重振日本,直至争取日本的国际领导地位。中国是安倍积极和平主义的主要针对国家。本文将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战略植入战略互信的分析框架,认为该战略对中日战略互信构成严重的消极影响。中国应该充分认识该战略的本质,做好准备以积极应对,同时从中国利益出发,努力构建战略互信。

关键词 安倍政府 积极和平主义战略 战略互信 美国

随着国家间交往的空前紧密,信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追求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着力追求的外交目标,在快速发展的实力基础上,中国塑造地区形势的能力不断增强,构建信任也成为积极寻求地区稳定的方式之一。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美日两国不断强化同盟的内涵,应对中国崛起的意味更加浓厚。基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从属地位,基于美国对日本外交战略的巨大影响力,更基于日本与中国地缘的迫近以及复杂的历史纠葛,来自中美两方面的影响都使得日本对现阶段地区格局异常敏感。日本的国家战略对构建中日战略互信关系重大,这也正是探究中日战略互信构建的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提出一个分析国家间信任的框架,借以剖析中日战略互信的现状;第二部分重点展现安倍开展积极和平主义的实践,以求全面把握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的实质;第三部分通过将安倍积极和平主义外交的战略植入框架之中,探究积极和平主义外交对中日战略互信的影响;第四部分提出中国的应对。

一、信任问题的分析框架

国家的声誉、表现、责任性是研究国家间信任的主要内容,^①这种信任研究的“社会学模式”更偏向于国家间信任的主观认知,相对忽视了国际政治的实践性。这一研究缘起于对建立欧洲军事信任机制的考察,即国家间信任的开端是军事领域的信任,国家安全是构建战略互信的首要关注,在此基础上信任不断扩展到政治乃至战略层面。

战略互信是一个兼具主观判断与客观实践的概念。战略互信的构建需要国家根据现阶段本国利益需求,从主观认识上对对象国在本国实现利益过程中的位置与作用进行判断,并通过实践操作将战略互信所带来的助益固定化,以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需要说明的是,信任本是来源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概念,在这两个学科中,信任重点强调的是其主观认知。但对于国家来说,无政府状态下,确认的天然缺失使得仅有主观认识远远不够,这就需要通过实践操作来固化“确认”,并在更高层面上达成信任,即下文提出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战略互信包括两部分内容:战略和互信,即对于“战略”的“相互信任”。由于无政府社会

的“不确定性”,除主观的信任之外,还需要人为确定。而战略是对既定目标的实现过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既定目标。

在单元层面,国家首先关注的是安全,因为安全是获取任何国家利益的基础。由此,战略互信的构建,应该以国家安全为最基础的考量因素。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需要自助来实现安全,自助就需要发展自身实力。因此,虽然安全是国家的第一位关注,但是经济发展亦具有同安全同样的重要性。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安全也将受到威胁。所以,在单元层面,战略指涉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

在结构层面,国家为利益而动。利益的获取导致了国家间实力的改变。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就是系统的变化。^②系统的变化又导致单元获取利益能力的变化。因此,大国在结构层面关注的是现有国际结构是否有利于本国利益的获取。理论上,维持现状的国家是现存国际结构的既得利益者,改变现状的国家倾向于寻求结构的改变。因此,在结构层面,战略指涉国际体系的利己改变。

在社会学领域,学者以个体社会成员为研究对象开展对互信的研究。在个体间构建互信,往往只涉及到主观认识上的确认。信誉、交往经验、“一报还一报”策略等,都有助于个体间建立互信。^③无政府状态下缺乏中央权威、信任文化的虚无缥缈等因素使得达成信任的关键因素——确定性、可控性——难以自然实现,故国家间的信任极度脆弱。^④这使得国家间信任的基础不只是主观认识上信任,更要通过某种方式来确认。各国在战略互信构建过程中,要将主观的信任感固化来获得确认,以避免遭受损失。因此各国建立战略互信的第一层次是确认。

国家通过建构信任而获得利益是战略互信构建的最主要目标。相互确认获得了合作的前提,但如果只有确认则会缺乏效率。在符合双方利益的条件下,国家还可以在相互确认的基础上选择更进一步,相互理解与支持,至少是善意中立。这就为双方的积极合作提供诸多便利。这也构成了国家间相互信任的第二个层面。

综上,本文给出的战略互信的定义形成了 2×2 的矩阵模型。战略互信定义的完整表述就是:两国在涉及国家生存及发展,在涉及影响国际体系结构改变的重大问题上,就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和行动相互确认不相伤害,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相互理解与支持,至少应该善意中立。模型由此从单元和结构两个层面构成四个象限(表1)。借助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明确国家间战略互信的现状,以及为构建战略互信具体需要促进的方向。

表 1 战略互信的定义

战略互信		战略	
		国家的生存与经济发展	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
互 信	相互确认		
	相互理解与支持,至少善意中立		

二、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

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相对应,是日本政治家对身处战后体制架构内的日本之于和平的主观能动性的探求,即从被动接受和平向主动营造和平的转变,^⑤体现的是日本国内右翼势

力对于战后体制的修正欲望。对安倍政府的国家战略制定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日本国际论坛撰写并于2009年10月提交日本政府的一份名为《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的战略报告,该报告直接催生了安倍内阁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并使积极和平主义正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国家安全的基本宗旨、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目标、周边安全环境与国家安全挑战、日本国家战略的战略路径。文件开章明义地指出,基于国际合作的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基本宗旨。^⑦

积极和平主义是近乎大战略的综合规划,本质上是安倍为日本迈向崛起规划的三步走战略:通过修正战后日本长期以来被迫恪守的和平主义体制,结合国际国内政治现实,辅之以经济支持,首先成为正常国家,继而实现强大的日本,最终达成日本的国际领导地位。这三个不同阶段中,积极和平主义是理论指引,国际合作是现实基础,对抗中国是幌子,国家正常化是出发点,日本的领导地位是至高理想。安倍本人对此也并不讳言:第一次上台时提出的执政目标就是摆脱战后体制,2012年二度执政之后又提出重振日本的口号,到2014年更是提出到2020年全面恢复日本的地位,对世界和平做出超出以往的贡献。^⑧

仔细看来,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表现为清晰的“一体两面”:一体是日本国家的三步发展、最终实现日本的崛起,两面则是国际合作和国内改革。积极和平主义战略据安保问题提出,其讨巧之处在于,无论国际合作还是国内改革,日本自身的安保问题都是重要关注点。安全保障既为国内改革提供了凭证,也为国际合作找到了依据。而当前地区、国际最容易抓住的“战略借口”便是中国,由此,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中国都成为了安倍借以发挥的幌子。

二战以来,尽管日本已经从废墟上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但大国地位并没有形成。这与日本外交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以及受和平宪法限制无法形成军事政治影响有重大关系。因此,要实现日本的领导就需要获得大国地位,要获得大国地位就需要日本的政治与军事的强大,要实现政治与军事的强大就必须先恢复为“正常国家”。对日本而言,要恢复为“正常国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政治独立、安保自主。解决的途径也无非两条:国际上摆脱战后体制强加的美日同盟;国内层面摆脱限制军力施展的和平宪法。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国内改革的关节点就是修改和平宪法,以转变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政策,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正常国家”可以自主行使《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力。面对日本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安倍的突破口在于解禁集体自卫权。

日本国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且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集体自卫权虽是《联合国宪章》授予成员国的合法权力,但由于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行使自卫权仅限于所需之最低限度,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参与了与自卫无关的行为,因此是违宪行为。^⑨尽管历届日本政府均遵从日本不拥有集体自卫权的立场,但安倍通过修改宪法解释,于2014年7月1日解禁了集体自卫权,接着在2014年12月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与公明党联合获得了475个议席中的326个,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如果自民党与公明党在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席位,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安倍就有了在国会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可能,并进而提交全体国民进行宪法修正草案的投票。根据《国民投票法》,获得超过国民有效投票半数赞成,安倍即可实现宪法第9条的修改。尽管目前从民调上

看,民意并不站在安倍一边,但安倍在修宪上已经取得的进展已经足以引起周边国家甚至世界各国的警觉。

修改和平宪法即意味着否定战后秩序,无疑要遭受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炒作中国威胁,在可控范围内对抗中国便成为安倍的合理选项。于是,从炒作中国巡航钓鱼岛到火控雷达事件,从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到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国威胁既是安倍的现实考虑,更是其借以实现“正常国家”的借口。炒作中国威胁成为了安倍“达成政治目的的工具,借机把战略矛头进一步指向中国……行使所谓的集体自卫权”。^⑩

根本上看,对抗中国、以中国为幌子是安倍本人及安倍内阁的策略,而并非根本目的。安倍本人重视对华关系,这不仅从他2006年上任伊始就首访中国可以看出,从被认为是其施政纲领的《走向美丽国家》一书中的章节设置亦可见一斑,书中论及双边关系时只提及了美日同盟与对华关系。通过协议确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安倍仍试图使用“政经分离”的手段,在经济上利用中国、政治上打压中国的尝试。2012年12月安倍再次出任首相以来,随着安倍内阁的外交导向逐步向积极和平主义转化,^⑪“安倍几乎所有的外交活动,行动背后的因素都是中国,”^⑫防范中国的策略开始逐步显露出来。

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提升,这对于历史上数次侵略中国的日本来说不啻为梦魇,更何况自身安全完全依托于另一个国家的保护。随着世界权力格局的变化,为权力转移早作打算也是现实的考虑。但是,现阶段安倍政府宣扬中国威胁,更大程度上是实用主义策略:既利用中国威胁为突破和平宪法、恢复正常国家提供借口,又呼应美国围堵中国、利用周边国家的防范意识拖延中国崛起,同时迫使美国支持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故而,安倍还积极从国际层面为其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努力。

从国际层面来看,日本要实现政治独立,在战后体制的束缚下,显然难以实现。这一束缚显然去之不易,鸠山由纪夫的下台充分表明,美国因素作为影响日本政治发展常量的角色并未改变,故而摆脱战后体制只能渐进展开,只能通过实现日本与美国的平等,通过“体制内”途径来实现“正常国家”的诉求。

依照此逻辑,积极和平主义的基础是国际合作就不难理解了。国际合作的基础正是美日同盟。美国因素既然无法排除,安倍就顺势强化美日同盟,修正美日同盟中的位置关系,使“美主日从”的不平等关系向“美主日辅”的平等关系转变。^⑬进而利用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构建自身的国际合作网络,在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同时,在与中国的对抗中寻求支持,实现日本的正常化。安倍强化美日同盟无疑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回报,2014年4月,奥巴马访日时第一次明确表示,美国对日本进行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事宜的讨论表示欢迎。^⑭

除了抓住美国这一“根本”外,安倍政府还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寻求通过建立价值观联盟,来显示日本的权威与优越感,并谋求国际社会对其恢复正常国家地位的支持与谅解。价值观外交是2006年安倍第一次上台时明确提出的外交政策方针,2007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所谓的“自由与繁荣之弧”,主要对象包括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印度,兼东南亚国家和中东欧多家。2012年安倍再次上台之后,继续坚持价值观外交作为外交方针,但涉及对象更加拓展。安倍并未将价值观作为开展外交的条件,而是将其作为“地球仪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倍以价值观为共同点,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框架之下,寻求“国际合作”,为打破战后体制束缚、恢复成为“正常国家”,乃至寻求建立强大日本和日本的领导地位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

当然,不论是绑住美国,还是大力开展价值观外交,都不无针对中国的意味。特别是美国自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针对中国崛起而布局的意味更加明显。安倍积极利用美国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心理,大肆鼓吹地区权力的失衡、安全局势的恶化,为修宪与发展政治军事力量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

总体看来,安倍政府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已初具雏形。尽管安倍经济学并没有为强大日本提供有力支持,但毕竟帮助安倍成功连任,并使修宪成为可能。希拉里两次宣布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涉及范围,美国对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修宪的支持,都可以看做安倍取得的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安倍内阁是以中国为自身发展的借口,其动作现阶段并非直接以对抗中国为根本目的,但大肆炒作中国威胁,妄图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插手南中国海问题等,客观上对中国的利益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行为,对中日两国间的战略信任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必须加以重视。

三、积极和平主义战略对中日战略互信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的分析,我们可将这一战略的影响植入模型之中,以清晰得出中日战略互信的现状,以及为提升双方互信指出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战略互信分析单元层面的第一个层次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保障的相互确认。安全是国家最根本的核心利益,涉及到领土、主权完整。无论是2011年中国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还是2013年日本发布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文件,都将领土完整列为最首要的国家利益。

中日间存在的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主要是钓鱼岛问题。钓鱼岛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本着中日关系发展的大局,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主张。但安倍上台以来,炒作中国威胁,强化对钓鱼岛问题的错误立场,坚持钓鱼岛在历史及国际法上均为日本的固有领土,根本不存在争议。^⑤这种不留余地的做法,使双方就这一问题无法达成任何共识,更不用说形成“确认”。与安倍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相对的是田中角荣时期日本政府的立场。当时田中角荣审时度势,默认了中方搁置争议的提议,这样双方就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尽管并没有达成“确认”,但是这一共识无疑具有“确认”的性质,使得双方得以在此基础上达成信任,进而寻求更加广泛的合作。

单元层面的第二个层次是关于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保障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中日双方在这一层次上也缺乏信任的基础。台湾问题事关我国核心利益。受历史及美国因素的影响,尽管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理解与尊重”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并没有直接承认。而且,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提升日台关系的倾向明显,日台实质性关系有所发展。^⑥从1999年初到2012年底,日本国会议员访台高达1166人次,涉及议员442人,年均访台83人次,次数和频率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国会议员。^⑦安倍第二次上台以来,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日本有意模糊台湾海峡是否属于《日美合作防卫指针》界定的“日本周边”的做法,意图无非是阻碍两岸统一,阻滞中国崛起。

结构层面战略互信的第一个层次是对于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确认。1972年9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达成了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国家建立霸权的共识,^⑧到1978年8月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时,双方将这一共识

扩展到亚太及其他任何地区。^⑩到冷战结束后,日本依靠其经济实力,开始寻求日美欧三极主导的世界体系格局。^⑪尽管这与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反对霸权主义、坚持世界多极化的战略追求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趋近,但双方均未对对方的观点表达过认同,在双方达成的官方文件中也没有相关表述。

安倍推行其积极和平主义战略以来,日本已然失去了成为独立一极的冲动。尽管安倍重弹“日本的领导地位”,但这样的领导地位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其目标是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维持者,寻求日美共同主导,^⑫这本身是对世界多极化的背离。因此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战略,与中国的战略选择难以匹配,无从达成确认。

尽管中国综合实力迅速提升,但中国始终秉持不称霸、不扩张,更无意与美国争夺主导权。中期看来,积极和平主义战略所指引的“重振日本”难以脱离美国因素,但从长期看来,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甚至“强大的日本”,乃至确立日本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领导地位后,美日同盟存在的基础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如何发展,都会充满变数。中日在世界结构的变化上无从达成确认,因此也就不存在第二层次的相互理解与支持了。

整体看来,将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战略影响下的中日关系现状植入到本文第一部分建立的战略互信框架中(表2),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单元与结构两个层面构成的四个层次,中日两国均缺乏达成互信的基础,因此,两国战略互信度极低,处于高度的战略互疑状态。

表2 中日关系的战略互信分析

战略互信		战略	
		国家的生存与经济发展	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
互信	相互确认	缺失	缺失
	相互理解与支持,至少善意中立	缺失	不明朗

四、中国的应对

尽管这一战略号称“和平主义”,但是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显然名不副实。^⑬中国是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的主要针对对象。在安倍为日本发展设计的“三步走”过程中,中国始终是日本行动的“借口”。日本寻求“正常国家”地位而谋求修改和平宪法时,安倍借助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防范心理,以价值观为抓手积极营造国际网络,寻求国际社会对其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谅解与支持;在安倍追求“强大的日本”时,安倍又以中国凭借实力改变地区现状为借口,制定了包括《国际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的所谓“安保三箭”,^⑭力图为重振日本奠定扎实的军事实力基础;在长期层面为日本的领导地位规划时,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国际制度的冲击,又成为其借口。

对此,中国应有清晰的认识。就日本重为正常国家而言,“日本修宪虽然还需要跨越一些法律门槛”,但“我们对这一进程很难阻止。关键是成为正常国家的日本会对国际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如果并非破坏现有国际秩序,这样的正常国家应该视为可接受的。”^⑮

此外,安倍寻求重振日本的领导地位,最终指向只能是现有秩序缔造者的美国。日本国内的离美倾向、美国对于独立的日本倒向中国的担忧,均可成为我国外交可资利用的积极因素,故而不刻意回避。近代以来日本便有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两大思潮的斗争,^⑯在中国崛

起而美国相对衰落的形势下,就日本自身而言,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长期对抗并不符合其国家利益,日本总体的发展道路仍将是与中国构筑战略互信。就此,我国可做以下应对:

首先,应对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战略下以我为借口而进行的战略布局,防止被孤立。安倍的价值观外交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在其打造所谓价值观联盟的形势下,我国应该做好相关宣传说明工作,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加以应对。

其次,应该充分认识到该战略的根本目的是日本的“独立国家”追求,充分看到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后摆脱美国影响的内部动力。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战略在一段时期内符合美国搅乱我国周边、阻滞我国发展的战略考虑,但也对日本国内、美日同盟以及日本与东亚各国关系造成了诸多困境。^⑤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的长期后果甚至可能是美国失去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基石。这是美国难以承受的,也有利于我国化解美日同盟的掣肘。

最后,我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安全稳定的周边符合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积极构建与日本在内的各国的战略互信仍应该是我国的战略追求。短期内追求的应是以实力促信任,只有具备足以威慑对手的实力,才能应对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的针对性;中期来看,中日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尽管近年来出现“经冷”局面,发展经贸关系仍是互利共赢,也是牵制日本的一个因素;长期看,文化交流不可或缺,中日间的文化交流不仅是民族和解,也更是构建中日战略互信的重要推动力。

注 释:

- ①李淑云:《信任机制:构建东北亚区域安全的保障》,《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第32-38页。
- ②肯尼兹·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苏长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06页。
- ③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④彼得·史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第32页。
- ⑤伊藤憲一『新・戦争論 積極の平和主義への提言』、新潮社、2007年、176頁。
- ⑥王珊:《安倍政权“积极和平主义”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6期,第8页。
- ⑦「国家安全保障戦略」、内閣官房、<http://www.cas.go.jp/jp/siryoku/131217anzenhoshou.html>。
- ⑧「安倍内閣総理大臣平成26年年頭所感」、首相官邸、2014年1月1日、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0101nontou.html。
- ⑨武田康裕、神谷万丈主编:《日本安全保障学概论》,刘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320页。
- ⑩刘江永:《钓鱼岛之争的历史脉络与中国关系》,《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3期,第19页。
- ⑪沈海涛:《从安倍主义到积极和平主义:安倍外交动态失衡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17页。
- ⑫柯劲松、毕春玲:《安倍晋三中国观与历史观探源——基于智囊与亲信的角度》,《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98页。
- ⑬蔡亮:《安倍内阁“积极和平主义”的三重特征评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5期,第85页。
- ⑭「日米共同声明:アジア太平洋及びこれを越えた地域の未来を形作る日本と米国」、日本外務省、2014年4月25日、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3_000756.html。
- ⑮「第百八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302/28siseuhousin.html。
- ⑯孙云、董云:《冷战后的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集刊》,2001年第1期,第18页。
- ⑰王海滨:《日本国会议员访台活动趋势、意图及影响》,《国际论坛》,2014年第1期,第26-27页。
- 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下转第33页)

日本－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钱亚平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通过倡导与湄公河流域各国的双边合作机制、政府发展援助、参与多边合作机制等多种方式,深入参与到大湄公河次区域(GMS)的合作中。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这种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机制的构建,既是出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是为了抗衡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在该次区域的广泛参与对中国的湄公河战略提出了挑战。为此,中国应注重“以人为本”,加快次区域合作的民意基础塑造。同时,中日两国应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恶性竞争,才能真正实现次区域合作的“共赢”。

关键词 区域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 中日关系

大湄公河次区域^①地处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结合地带,也是联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这一地区又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南半岛局势逐渐缓和,“从战场变成市场”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受到域内外国家的重视,日本亦不例外。不同国家和机构主导的合作机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功能上相互重叠甚至相互竞争的区域制度网络。自2008年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峰会以来,日本加大了日本－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以下简称日湄合作)的建构,越来越凸显出与中国竞争的态势。日本试图通过经济援助、倡导区域合作机制等手段,对抗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也给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增加复杂多变的新因素。

一、日湄合作的战略演变

日本可谓介入大湄公河次区域最深的域外国家。早在1957年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提出“湄公计划”后,日本即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日本多次派出调查团前往湄公河下游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其勘察报告成为老湄公河委员会开展工作的重要依据。日本还为湄公河地区提供了大量的政府发展援助,除同属西方阵营的泰国外,日本还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国进行大量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

冷战的结束和1991年《柬埔寨和平协定》的签署,为日本深入这一地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日湄合作主要出于两大动因。政治上,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合作是日本实现其政治大国抱负和取得东亚主导权的外交战略的一部分。经济上,日本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援助国和投资国,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繁荣和稳定关乎日本的切身利益。具体而言,冷战后日本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推动印度支那三国加入东盟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意识到,东南亚国家是帮助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伙伴。

为此,日本努力推动柬埔寨和平进程,通过参与联合国柬埔寨维和行动,首次实现了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目标。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日本在解决地区冲突等热点问题上发挥政治大国作用的试验场。^②经济上,日本政府将援助的重点从原来的东盟六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及文莱)转到了刚刚改革开放的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

日本希望促进东盟扩大以获取其支持。因此,日本一方面积极推动印度支那三国加入东盟,另一方面,也通过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扩大日本在印度支那的“阵地”。90年代以来,东盟经济高速发展,增长率连续几年超过亚洲“四小龙”;东盟区域一体化不断前进,但东盟六国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尤其是经济鸿沟)阻碍了其扩大。为此,日本积极援助印度支那三国。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问东南亚时,表示愿为东盟与印支三国结成伙伴关系提供帮助。^③在海部的建议下,次年日本举办了有关“柬埔寨复兴”的国际会议,日本对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合作和共同繁荣”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④

1993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泰国曼谷时首次提出了建立“印度支那综合发展论坛”(FCDI)的倡议。1995年,首届论坛部长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三个目标:从整个地区角度发展印度支那、协调国际合作、促进三国的市场经济。日本原本希望通过这一论坛主导印度支那地区的发展,但这一构想并没获得各国支持,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一是美国对此兴趣寥寥,在首届部长会议上美国只派出了观察员,这一保留态度打击了日本的积极性。^⑤二是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ADB)倡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合作)迅速发展,成为主导这一地区的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日本外务省由此将注意力转向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再次,90年代中期以后,越南(1995年7月)、老挝和缅甸(1997年7月)以及柬埔寨(1999年4月)相继加入东盟,东盟希望自己主导新成员的发展,并不愿意支持日本的倡议。1996年,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AMBDC)第一次部长级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召开,正式形成了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计划。因此,日本认为倡导新的多边机制的条件并不成熟,“未来最现实的措施不是建立新的机构,而是日本和非沿岸东盟国家最大限度地利用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以实现日本和东盟之间的广泛合作。”^⑥由此,“印度支那综合发展论坛”及相关倡议搁浅,日本将重点转向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

2. 日本-CLV机制下的日湄关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盟各国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的相关举措赢得了东盟各国的好感,此后中国和东盟关系持续升温。2001年中国与东盟确定要在十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之后,日本深感与东盟的关系已被中国抢占了先机。^⑦为了对抗中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决定另起炉灶。2003年12月,日本邀请东盟十国领导人到东京参加“东盟-日本纪念峰会”,在这一会议上,日本首次把湄公河地区提上议事日程。日本公布了《湄公河地区发展的新观念》,表明了21世纪初日本对湄公河地区的基本政策,包括三个愿景、三项扩大和三大支柱。^⑧日本提出,要加强湄公河地区一体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确保环境和谐。

不过,这一时期日本所指的“湄公河地区”主要还是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等印度支那三国,并没有包括缅甸和泰国。2004年,第一届日本-CLV(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外交部长会议在老挝万象举行,尽管日本与柬老缅越四国在其他场合也有各种合作与接触,但作为制度化的对话还是第一次。^⑨日本宣布,在其湄公河开发计划框架内,今后三年内为柬老越提供15

亿美元的援助,用于改善三国的交通、电力和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⑩

此后,日本—CLV 外长会议定期举行。2006 年,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计划,即把欧亚大陆外围兴起的新兴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就是“自由与繁荣之弧”上的重要一环。为了通过湄公河流域国家推动次区域合作,2007 年日本公布了《日本—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即新的湄公河地区政策,其中包括三个目标、三大支柱和三项新举措。^⑪三个目标为:加强日本与湄公河地区的伙伴关系;实现湄公河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湄公河地区人们的生存、生活和尊严及实现其富裕的可能性。^⑫三大支柱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和扩大日本与该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支持该地区人民追求普世价值观。^⑬在这一合作计划中,日本开始实行“价值观外交”,将次区域发展与价值观推销结合起来。不过,日本的重点仍是印支三国。日本提出将在今后三年为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提供 4000 万美元的援助,其中 2000 万美元用于建设柬老越三国边境地区的“发展三角”。同年 11 月,福田康夫首相与柬老越三国首相在新加坡举行“日本—CLV 首脑会议”,就进一步加强日本与印支三国的关系达成一致。

3. 日本—湄公河国家峰会与日湄关系机制化

从 2008 年开始,日本真正把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视为一个整体,并将日湄合作逐步机制化。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政策,与其合作只是日本东南亚政策的一部分。2008 年 1 月 16 日,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在东京联合召开了首次“日本—湄公河地区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将整个大湄公河次区域称为“希望和发展的地区”,将其湄公河外交的核心定为“信任、发展、稳定”,^⑭计划对五国提供一揽子援助合作。日本将 2009 年定为日本湄公河交流年。^⑮双方决定每年举行首脑峰会,定期举行外交部长会议和经济部长会议以及高官会,至此,日本—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实现机制化。

2012 年 4 月,在第四届日本与湄公河地区首脑峰会上,双方通过了《日本—湄公河合作 2012 年东京战略》,制定了 2013 年到 2015 年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具体合作计划。日本提出了包括高速铁路在内的 57 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总额达 2.3 万亿日元,并允诺在今后三年通过贷款、无偿合作基金、技术援助等形式提供约 6000 亿日元的援助。^⑯

这一时期日湄关系的迅猛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的全面崛起让日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遇冷,日本希望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联系以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其次,美日同盟历来是日本亚洲外交政策的基石,2009 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加大了对湄公河地区五国的投入,美国不仅深化与传统盟友泰国之间的联系,还开始修复与越南、缅甸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湄公河下游倡议”计划,致力于通过经济发展援助、环保和人权行动来扩大美国在湄公河地区的影响力。作为美国的忠实盟友,日本随即在行动上支持美国,并试图借助美国的亚太战略,确立起日本的地区主导地位。再次,日本一直努力争当政治大国,在东南亚的“金元外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获取这些国家对日本政治上的支持。如在 2008 年 1 月召开的首次日本—湄公河地区外长会议上,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均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后,在经济上,2008 年前日本一直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但 2008 年后被中国取代。为了与中国竞争,日本加紧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外交力度。日本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援助,而且支持企业在泰国等地兴建大规模的制造基地。^⑰2012 年前三个月,在对越南进行投资的 26 个国家和地区中,日本排名第一,占新批以及增资资金总额的 88.8%。^⑱缅甸民主化改革以来,日本也表现出罕见的

热情,安倍称“我们愿举官民之力,支持正在推进民主化的缅甸的国家建设。”

二、日湄合作的特点

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关系的发展得益于长期的经营。第一,日本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具有持续性。日本一直是该次区域各国稳定的援助者,以越南为例,近 20 年来日本一直是越南最大援助国,2008 年,日本在越南的政府援助中仍占到 27% 的比重。^⑩长期的援助促进了两国的双边关系,也为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商业利益。

第二,日本不仅长期在一个领域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而且通过后续的援助和改进,将援助渗透和外溢到各个领域。如日本援助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交通发展计划,从 1994 年一直持续到 2004 年,提供了 20 亿美元,参与了 25 个项目。^⑪由于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带来了交通拥堵、空气和噪音污染等问题,作为原计划的后续补充,日本又参与到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中。

第三,从合作领域看,基础设施是日本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重点领域。早在 1996 年,日本私营部门专家就组成了“发展大湄公河地区战略工作小组”,并发布报告,对其基础设施发展提出全面的计划。在第四次“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峰会”上,日本提出的政府发展援助也主要用于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安倍上台后,2013 年日本提出了“基础设施体系出口战略”和“日本振兴战略”,希望重整日本经济,东南亚地区成为重要的突破口。基础设施技术出口,成为日本经济外交工作重点推进的领域,日本希望借助亚洲国家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契机,推动日本富有竞争力的核电、高铁、水电、火电等项目的出口,并以此谋取对亚洲经济及亚洲市场的控制权。在参与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日本对东西经济走廊和南部经济走廊特别感兴趣。尽管日本的援建旨在为日本企业投资创造良好的基础,但客观上也改善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对各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推动力。除了基础设施等硬件公共产品之外,日本还提供了大量“软性公共产品”,如为规划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例如日本为越南提供法律人才培养,促进其法制改革。

第四,日湄合作中,并非只是单向的政府间合作,而是形成了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多层次、网络状的合作模式,日本的非政府组织(NGO)、私营部门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外务省或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在项目实施前进行的可行性研究或调查中,通常会邀请非政府组织参与。此外,非政府组织本身也成为影响日本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如总部位于东京的环保组织“湄公河观察”长期督促日本政府在湄公河建坝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⑫2008-2009 年,“湄公河观察”成功劝说外务省对柬埔寨国家公路一号项目安置的当地居民以合理的价格进行赔偿。^⑬“湄公河观察”还对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湄公河流域的项目进行监督。此外,日本还派遣大量志愿者到东南亚贫困山区长期驻扎,援助当地建设,小到用水用电、疫苗防治,大到城市和产业规划,全方位、宽领域地持久落实援助政策。例如,日本自 1993 年就已在缅甸实行“草根计划”,帮助缅甸铺桥修路,建学校和医院,实施雨水工程等,截至 2014 年已经实施了 694 个项目。^⑭这些合作极大改善了日本的国家形象,日本外务省 2014 年 3 月对东盟七国的一份民调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东南亚人把日本选为 11 个国家中最可靠的国家,其得票率远高于中国。^⑮

第五,日本还大力推动公私部门之间的合作。日本通过培育和发展公私伙伴项目,完善

公私部门合作框架、人力资源培训等形式,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日本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日本企业进入湄公河地区,而且能够较大幅度地惠及更多民众,也增强了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2012 东京战略》中,湄公河地区国家认为“日本是一个长久的、可以信赖的而且必不可少的伙伴。期望日本能够在地区发展繁荣的协调合作上发挥领导作用,欢迎日本维持其在该地区的重大利益”。^⑤

三、日湄关系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的应对

中国自 1992 年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来,不仅加强了与五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极大地改善了周边环境。但是近年来,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也面临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中国的快速崛起引起了部分周边国家的担忧,^⑥由于中国在国土面积、人口总量、经济规模等各方面都占据绝对的优势,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周边弱小国家的不安,他们希望利用域外国家来平衡中国的力量;二、湄公河地区属于欠发达地区,他们需要日本等国的资金、技术来促进本地区的发展,客观上会对中国与这一地区的经贸投资带来影响;三、美重返东南亚,加大了对中国周边事务的干涉和制衡,也激化了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分歧;四、中国与越南等国海洋领土争端升级;五、中国周边国家中,泰国、缅甸等政局不稳或军事冲突现象增多,这些变动给中国周边安全和政治安全带来不稳定性。尽管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已经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上述因素使得这一合作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复杂性和难度。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中日两国不可避免地存在竞争。首先,日本会与美国、印度等区域外大国联手,压制中国的战略空间,尤其是利用环境、水资源利用等问题来散布“中国威胁论”。如日本已明确支持湄公河-印度经济走廊的建设,并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计划。其次,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也希望利用中日竞争从中渔利。即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框架内,日中不同项目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如中国援建了从云南省南下到泰国、越南的南北经济走廊,日本更青睐于发展横跨中南半岛的东西经济走廊和连接泰国曼谷、越南胡志明市的南部经济走廊。在基础设施方面,中日之间的竞争已经白热化,如在高铁投资和技术方面,2014 年 12 月,李克强总理会见泰国总理巴育时签署了《中泰铁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两国达成共建中泰高铁的协议。但几个月后,日本和泰国政府达成一致,连接泰国曼谷和清迈的高速铁路将采用日本新干线。高铁的争夺看似仅是技术标准和项目之争,但背后实际上是对次区域合作规则制定权的争夺。

日本是中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竞争者,但并非意味着中日双方没有合作的可能。中日能否处理好次区域合作中的关系,不仅关系到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因此,中国需要调整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理念和方式,一方面需要继续深入次区域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日本的沟通和协调。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深化中日湄公河政策对话机制

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的战略目标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希望通过合作获取资源,同时促进次区域共同发展,并稳定中国的周边环境。日本则希望获取市场、资源和次区域合作的主导权。双方如果缺乏沟通和协调,可能会给次区域合作带来消极影响。从 2008 年起,中日双方每年举行中日湄公河政策对话,就湄公河次区域现状、各自对湄公河次区域政策和

促进湄公河次区域开发、贸易投资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②这一机制有效促进了中日之间的良性互动。不过,由于钓鱼岛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这一对话机制一度中断。2014年,时隔三年后,中日第五届湄公河政策对话在北京召开,双方就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支援的现状交换意见。^③但这一机制主要局限于中国外交部和日本外务省官员之间的交流,其合作层次和范围仍有待提高。中日作为卷入大湄公河次区域最深的两个地区大国,不仅需要在湄公河开发各个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也要在一些领域探索进行功能性合作,因为稳定和发展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符合中日的共同利益。

(二)从重视官方合作转向官方和民间并重

以往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间的合作,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领导人或政党的更替,会直接影响到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也会使中国在这些国家的经贸投资面临巨大风险。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市民社会的兴起,这种官方合作模式必然受到冲击。如中国拟投资36亿美元修建的密松水电站被暂时搁置,就是受到缅甸国内政治的影响。虽然这一项目得到了缅甸军政府高层批准,但在动工兴建之前并没有征得当地民众和少数民族地方武装的同意,因此受到后者的阻挠。尤其是大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分配问题,关乎沿岸各个国家、各个阶层民众的利益,如果不把沿岸民众的利益考虑在内,就很容易引起当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反对,进而影响到中国与该国的合作,甚至有损中国形象。因此,在发展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关系时,应该注重政府与企业、精英和草根等各个阶层之间的全方位接触。

(三)重视非政府组织的培育

大湄公河次区域活跃着大量非政府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如老挝境内“沙耶武里水坝”项目、莱比塘铜矿等项目都因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压力而停工。这些非政府组织往往受到日美的资金支持,因此经常充当本国政府外交的执行伙伴。如日本“基层人类安全援助计划”资助了一些泰国的非政府组织,“湄公河观察”也与日本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也应培育和资助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的发展,使其广泛参与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项目的前期调研和考察中,以提高政府决策的可行性。同时,通过非政府组织的信息搜集,促进多层次社会交往;此外,非政府组织出示的一些调研报告也能为中国面对西方国家质疑或修改方案时提供智力支持。

(四)与多边机构开展广泛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多种合作机制在不同层面发挥作用的格局将长期存在。尤其是日本主导的日本-湄公河国家首脑峰会、美国主导的“湄公河下游之友”、东盟主导的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都将继续发挥作用甚至互相竞争。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性质上的开放性、合作内容的广泛性和参与机制的多重性,是现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重要特点。^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有所侧重。20多年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如经贸方面,内部成员国间的贸易、投资继续增长,2013年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五国贸易总额达到1500多亿美元。^⑤甚至可以说,中国在次区域合作中的核心作用正在形成。但中国还应该加强与其他机制和各国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中国应该加强与东盟、湄公河委员会等的合作,继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启动之后,2014年中国-东盟又启动了自贸区升级版,这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2015年,在泰国的倡议下,中国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又在中国-东盟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

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首次高官会于 2015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六国表示愿意加强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次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③此外,中国也要积极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中国自身主导的机制,为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大的融资平台。

(五)拓宽次区域合作领域

中国应该拓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领域,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又开始甚嚣尘上,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被认为是资源掠夺,因此,要提倡“以人中心”的合作。一方面为当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及社会服务,另一方面要通过文化交流等培养“亲华派”,以改善中国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形象。中国要创造与大湄公河次区域休戚与共的合作模式,在中国主导的区域合作项目中,也要纳入其他国家占主导的经济利益和观念信仰,以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和追随。为此,中国应创新合作模式,积极推广或复制中国的一些最佳实践,如建立与次区域国家的合资企业,尤其是在能源和矿产资源等方面的合资企业等;将工业园区等模式复制到大湄公河次区域等,让周边次区域国家参与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来,直接从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受益。

结 论

大湄公河次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进行交往的天然通道,中国与这一地区不仅地理相邻,也有着文化和民族上的依存关系。但这种地缘政治上的相邻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创造了合作的可能性,也容易引起相邻国家的猜忌。随着日本等域外国家的介入,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也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应改变合作的理念和方式,积极倡导“以人为本”的合作理念,注重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创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不仅仅是基础设施上的互联互通,更是次区域层面新的认同的塑造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作为次区域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倡导者,不可能被排斥在外。中日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存在着共同利益,次区域合作的顺利进展,需要中日两个地区大国在资金、技术、人才培养、制度建设等多方面的合作,如此才能促进次区域乃至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注 释:

①本文所说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包括上游的中国云南省和广西省,仅指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东南亚五国。

②金熙德:《日本对东南亚外交的转折——从福田主义到桥本主义》,《当代亚太》,1998 年第 7 期。

③日本外务省:《外交青书》,1991 年,第 401-410 页。

④白如纯:《日本对东盟政策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06 年第 6 期,第 85 页。

⑤Masaya Shiraishi, “Mekong Chiiki Kyoryoku to Betonamu” (Meko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Vietnam), in Masaya Shiraishi ed., *Betonamu no Taigai Kankei (Vietnam's External Relations)*, Akatsuki Inshokan, Tokyo, 2004; 转引自 Masaya Shiraishi, “Japan Toward the Indochina Sub-Region,”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No. 13, October 2009.

⑥ “Statement by His Excellency Yohei Kono,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Japan-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kyo, July 28, 2000, <http://www.mofa.go.jp>.

jp/region/asia-paci/asean/conference/pmc00/state0007.html.

⑦张声海:《从东京会议看东盟与日本关系的新发展》,《当代亚太》,2004年第3期。

⑧“New Concept of Mekong Region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okyo,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asean/year2003/summit/mekong_1.html.

⑨曹云华:《东南亚地区形势:2008年》,《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2期。

⑩“Joint Press Release of Cambodia, Laos, Vietnam (CLV) and Japan Summit,” November 30, 200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clv/joint0411.html>.

⑪“Japan - Mekong Region Partnership Program,”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okyo,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goal.pdf>.

⑫「日本・メコン地域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プログラム」,2006年12月、http://www.mofa.go.jp/mofaj/area/j_clv/pdfs/mekong_pp.pdf.

⑬“Speech by Foreign Minister Masahiko Koumura, Growth of the Mekong Benefits ASEAN, and Growth of ASEAN Benefits Jap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okyo,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speech0805.html>.

⑭“Chair’s Statement Mekong-Japan Foreign Minister’ Meeting,”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Tokyo, 16 January 2008,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meet0801.html>.

⑮同上。

⑯“Tokyo Strategy 2012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April 21, 2012,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4/joint_statement_en.html.

⑰《安倍会晤昂山素季日将在缅建经济特区》,《参考消息》,2013年5月26日。

⑱暨佩娟等:《日本势力高调再进东南亚》,环球网, http://world.huanqiu.com/depth_report/2012-04/2673312.html。

⑲Edward M. Feasel,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and Conflict: A Case Study on Japanese ODA to Vietnam,” in William Ascher and Natalia Mirovitskaya ed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dentities, and Conflict in Asia*,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213.

⑳Ibid., p.214.

㉑《湄公河流域大坝建设影响6000万人:日本政府应在湄公河委员会会议上发挥积极作用》,2013年1月14日, http://www.mekongwatch.org/PDF/CSO_MekongDamLetter_to_GoJ.pdf.

㉒Mekong Watch Japan 2008, “Phnom Penh to Ho Chi Minh City Highway Project (ADB Loan 1659-CAM),” <http://www.mekongwatch.org/english/country/cambodia/HighwayOne/MATERIALS6-1-d.pdf>.

㉓罗圣荣:《西方国家在缅甸大力开展软实力建设》,《世界知识》,2015年第8期,第74页。

㉔“Southeast Asia views Japan as Most Reliable Country, Poll Says,” *The Japan Times*, <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2014/04/19/national/southeast-asia-views-japan-as-most-reliable-country-poll-says/>.

㉕“Mekong-Japan Action Plan 63,” November 7, 2009,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911/action.html>; “Action Plan for ‘A Decade toward the Green Mekong’ Initiative,” October 29, 2010,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2/gm10_i-ap_en.html; “Tokyo Strategy 2012 for Mekong-Japan Cooperation,” April 21, 2012,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mekong/summit04/joint_statement_en.html.

㉖Bruce A. Elleman, Stephen Kotkin and Clive Schofield eds., *Beijing’s Power and China’s Borders: Twenty Neighbors in Asia*, New York: M. E. Sharpe, 2013; 钱洪良主编:《中国和平崛起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反应》,军事谊文出版社,2010年。

㉗外交部网站:《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1179_611310/t450744.shtml。

⑳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Japan-China Policy Dialogue on the Mekong Region,” December 2, 2014, http://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4e_000540.html.

㉑ 贺圣达:《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和中国的参与》,刘稚主编:《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㉒ 新华社:《李克强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五次领导人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全文)》,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4-12/20/content_2794565.htm。

㉓ 《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主持首次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外交高官会》,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b_602314/zjzg_602420/yzs_602430/xwlb_602432/t1252301.shtml。

(钱亚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贺平)

(上接第24页)

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⑳ 胡令远、王盈:《日本对非外交的新理念、新动向及新挑战——以2005年入常受挫为起点》,《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6期,第72页。

㉑ 蔡亮:《安倍内阁“积极和平主义”的三重特征评析》,第87页。

㉒ G. McCormack, “Japan’s ‘Positive Pacifism’: Issues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Contemporary Foreign Policy,”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20, No.2, 2014, p.74.

㉓ 吴怀中:《安倍“安保三支箭”的指向解读》,《世界知识》,2014年第2期,第27页。

㉔ 梁云祥:《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中日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42页。

㉕ 钱建南:《影响日本发展的两大思潮》,《世界经济与政治》,1988年第10期,第18页。

㉖ Stephanie A. Weston, “The Dilemma of Japan’s Proactive Pacifism in Asia,” http://www.adm.fukuoka-u.ac.jp/fu844/home2/Ronso/Hogaku/J59-2/J5902_0169.pdf.

(马萧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浅析安倍政府的“印太海洋战略”

秦小霞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印度与印度洋战略重要性上升等背景下,“印太概念”逐渐变成现实,引发亚太区域内相关国家对外关系的调整。2014年,日澳与日印在海洋安全领域加深双边合作。在日本看来,印太是“两洋交汇之处”,也是日本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关键点,日本应在深化日美海权同盟关系的同时,整合印度洋与太平洋中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形成“印太”区域海洋同盟。由此,安倍政府提出由日美澳印组成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积极推进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

关键词 印太 两洋交汇处 安倍政府 日美澳印 海洋国家战略

近年来,随着“印太概念”逐渐变成国际政治现实,亚太地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引发域内国家对外关系的积极调整。2014年,安倍出访澳大利亚,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日澳与日印加强双边海洋安全合作,乃至定期进行海上联合军演,明示“印太概念”的“具体行为化”。在日本看来,印太是“两洋交汇”之处,正是日本“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关键点,将印度洋与太平洋整合于同一个地区战略框架下,与日本的海洋通道叠加,成为日本海洋国际战略的侧重点。^①2015年安倍访美,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同时整合印度洋与太平洋中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形成印太区域海洋同盟,推进日美澳印组成的“亚洲民主安全菱形”,进一步贯彻实施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本文以印太地区为背景,论述安倍政府时期的海洋国家战略,对日本提出的日美澳印海洋国家同盟进行初步分析。

一、安倍政府的海洋战略

日本一直以“海洋国家”自居,进入21世纪以后,更加重视海洋问题,将海洋问题提升为国家战略,并提出“认识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的三个基本点。在2013年《海洋基本计划》中日本也提到由“被海洋守护的国家”到“守护海洋国家”的转变,为守护海洋做出积极的努力。^②随着“新海洋立国”理念的出台,特别是在安倍政府时期,日本更加重视海洋问题,完善海洋立法,并通过价值观外交,构筑日美澳印等民主国家的所谓“自由与繁荣之弧”,形成“海洋国家”联盟,并大肆渲染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此实现日本的综合海洋战略。

2007年4月,安倍第一次内阁制定完成了《海洋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启动日本的海洋战略。海洋基本法的第一条宣布:“实现和平,积极开发利用海洋,保全海洋环境的和谐——实现新的海洋立国十分重要,规定海洋政策的基本理念,明确地方公共团体、事业者以及国民的义务,在海洋基本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设置综合海洋本部,推进海洋政策计划的实

行,以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国民生活的安定繁荣。”^③2008年4月颁布《海洋基本计划》,2012年12月安倍政府依照《海洋基本法》,规定每隔五年海洋本部应制定新海洋基本计划,2013年4月,公布了今后五年推进海洋战略的基本计划草案。随着一系列与海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出台,日本海洋立法逐步走向完善。

日本的海洋战略是综合性的国家总体战略。《海洋基本法》中第七条规定:“海洋作为人类共享的资源,日本有义务在国际协调的前提下,为建立和谐的海洋秩序贡献义务并在此过程中发挥先导性作用。”^④这表明日本谋求在海洋国际事务中提高话语权、发挥更大作用、扩大本国利益从而实现海洋强国的战略意图。《海洋基本法》第二十一条指出,“日本四面邻海的环境决定了物资的大量进口,海洋的通商通道为日本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日本必须为维护海洋秩序,保护海洋安全采取必要措施。”^⑤从安倍政府出台的法律可以看出,日本为了争夺海洋资源不断强化利用海洋的安保措施。《海洋基本法》规定建立国家战略指挥中枢“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首相亲任本部长,主管大臣为海洋政策担当大臣,其余成员由国务大臣兼任,内阁官房负责处理海洋本部事务,海洋本部负责制定并实施《海洋基本法》,都、道、府、县自治政府及其下属行政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管理海洋事务。由此日本建立起了一元化的海洋战略领导体制,提供了高效推动海洋战略的制度保障。^⑥

在《海洋基本法》基础之上,2013年4月,安倍政府又公布了今后五年海洋政策的新指南《海洋基本计划》,作为全面实施海洋战略的具体战略细则,具有以下要点:首先,《海洋基本计划》将海洋资源的开发与推进作为重点,强调振兴海洋产业,完善海洋能源开采技术,实现可燃冰的商业化等,加快开发海洋资源。关于排他性经济水域,《海洋基本计划》规定“推动排他性经济水域的开发,在东海南海海域,针对我国与外国重叠的海域,根据国际法进行解决,全力保护我国的排他性经济海域”。^⑦其次,“海上安全的确保”,完善海上保安厅及海上自卫队体制。《海洋基本计划》规定“加强海洋军事力量,为维护海洋交通以及防止海上犯罪贡献相应力量,从而维护区域内海洋秩序;提高海洋预警能力,深化对海洋灾害的预防科技研究,减少海洋带来的危害;为维护周边海域的安全,提高对外国军事动态的重视度,紧密观察周边国家军事活动。”^⑧最后,保全以排他性经济水域为根据的离岛,制定低潮线保全法、低潮线保全基本计划,在地图和海图上对名称不明确的离岛使用统一名称,对确保海洋资源的重要离岛采取特别管理与振兴措施。^⑨

安倍政府通过制定《海洋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其海洋扩张战略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在战略规划阶段做足了功课,以此来实现日本“海洋强国”的梦想。

二、修改防卫政策,构筑海上防卫力量

日本为了推进其“海洋强国”战略,不断冲破战后体制束缚,修改防卫政策,企图向“正常化国家”迈进。近年来,日本不断炒作“中国的海洋活动”对日本及亚太地区造成的“负面影响”,再加上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使得日本“借船出海”,不断修改防卫政策,构筑海上防卫力量,推进海洋战略。

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来,日本增强海上军事力量的势头有增无减。2013年出台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其防范对象由俄罗斯转向中国。军事部署重心也由北方转向南方,北海道坦克部队减少,自卫队裁减,向西南冲绳地区转移。新大纲也首次将“岛

屿部分”表述为“西南诸岛”，欲将钓鱼岛纳入其防范范围。^⑩在旧大纲中自卫队任务排序为“应对弹道导弹攻击，应对游击和特种部队攻击，应对岛屿部分侵略。”^⑪新大纲任务为“确保周边海空领域安全，应对岛屿攻击，应对网络攻击。”^⑫应对中国崛起，扩大海权和制海权已经成为了防卫政策调整最主要的目标。

安倍内阁时期 2013 年版的《防卫计划大纲》极力渲染日本周边环境不断恶化，扩大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崛起特别是海空军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军事安全保障的不透明性”，“中国在东海、南海等海空领域活动急速扩大，中国不断侵入我国领海领空，擅自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妨碍公海航行自由，引发周边事态的紧张。”^⑬2013 年日本颁布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为日本五年防卫装备发展计划提供了具体的实施步骤，“为了维护和发展开放而稳定的海洋，日本将不断发挥主导性作用”，^⑭日本为了实现“国家正常化”不断强化其“海洋国家”立场，调整防卫政策，增强海上防卫力量，为东亚地区稳定和谐带来不确定因素。

三、继续深化日美海洋同盟

日本推进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抓手在于加强日美海权同盟。安倍政府紧紧抓住美国战略东移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修改防卫大纲，深化日美防务合作，将美国拖入钓鱼岛问题。

美国把盟友推向第一岛链前沿，日本被视为其亚太战略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但美国对日政策却具有两面性，既要把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又对日本不放心，也不愿被日本与中国的冲突拖下水，只想加强对华遏制力而非发生正面冲突。日本则想利用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却又抱怨“以美制华”靠不住。两者在对华政策上有温度差，但是美国的基调仍是挺日制华。^⑮日本也借助其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借船出海，倒逼国内各派修改和平宪法，为行使集体自卫权扫清障碍，加强日美海权同盟，最后谋求其全球性海洋大国的意图。

2015 年 4 月，安倍访美，同奥巴马进行首脑会谈。4 月 29 日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强调通过制定新的日美防卫指针，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将更多地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为实现海洋的和平与安全，安倍提出了三原则：第一，一个国家不管有什么主张，必须遵循国际法；第二，不使用武力和威吓；第三，解决纠纷，使用和平的手段。“从太平洋到印度洋上的宽广大海，必须使它成为自由的受法律保护和平之海。为此必须强化日美同盟。”^⑯安倍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在日本首相中属首次，日美同盟的密切度被提升到空前水平，而此次“日美合作防卫指针”的调整也带来了新的变化。一是日美协调更加紧密。在新指针下，日美将组建新的同盟协调机制，以便在从平时到“意外”发生时的所有阶段都能实现双方政府整体性的无缝对接。二是日美合作更加广泛，扩大到全球范围。新指针在序言中明确强调，“美日同盟具有全球性”，只要日本在法律允许，日美同盟将为全球性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如维和行动、海上安全和后勤支持。在领域上，日美将在太空和网络等方面开展新的战略合作，并将有意识地扩大跨领域的合作，打造现代化的同盟以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三是美驻日武装更加强大。双方确认了美国将最新、最强武器装备配备在日本的战略重要性，以强化日美同盟的攻击能力。在新指针下，未来美国将陆续把大量最先进的海陆空装备部署在日本，包括嘉手纳基地的 P-8 反潜巡逻机、三泽基地的全球鹰无人机、横须贺基地的宙斯盾舰和岩国基地的 F-35 战斗机等。此外，美国在日本部署的弹道导弹防卫系统(BMD)也将更加完备。在 2014 年京都经岬分屯基地部署 AN/TPY-2 雷达的基础上，

2017 年前美国还会向日本调遣两艘 BMD 驱逐舰。^①

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使得日本在同盟中地位大幅提高,也给安倍内阁尽快实现修宪扩军、推翻战后体制提供了便利,给邻国、地区和世界的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隐忧。日美同盟一直是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基轴,但是在近年来,有人声称 21 世纪是中美两大国主导的世纪。为了防止 G2 成为现实,日本极力采取各种措施,调整日美同盟,不断加强同盟在防务等各方面的合作,利用美国发挥日本的积极作用,来推动日本海洋强国梦想的实现。

四、在印太两洋交汇之处构筑日美澳印民主安全菱形

随着日美同盟的强化和日本海洋战略的出台,安倍内阁积极通过建立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联盟来拓展日本的国家利益空间,为日本扩大其海洋利益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在国际战略东移,美国“重返亚太”,印度与印度洋战略重要性上升等因素作用下,“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概念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的学界和政界被广泛使用。^②日本也明确将“印太概念”具体行动化。

日本与印度战后很长时间内处于疏远状态,直到 21 世纪初,双方首脑互访,日印关系才向紧密化方向发展,2000 年森喜朗首相访问印度,双方建立了“日印全球伙伴关系”,2005 年小泉首相访问印度,双方建立起“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③2007 年 8 月 25 日,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在印度国会发表了“两洋交汇处”的演讲,强调日印具有自由、民主、人权等共同的价值观和战略利益,呼吁建立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倡导日美印澳为印度洋、太平洋的安全和平和繁荣承担责任。^④

安倍再度上台后,更加注重日印关系。在安倍访问印度时专门会见了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认定日本战犯无罪的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长子普拉桑塔·帕尔。2014 年印度莫迪总理访日,更使日印合作升温。在战略与安全上牵制防范中国使得日印两国有着共同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一直有着一种失落感,中国在地区和世界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也触动了日本脆弱的神经。印度与中国同样有着不愉快的记忆,双方仍然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近年来中国加强与南海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被印度解读为向南亚和印度洋大举扩张。上述心态使得日印谋求合作,日益接近。2014 年 9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日本,双方签署了《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宣布将两国关系由“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指出“彼此交融的利益、密切的海洋事务联动和不断增大的国际责任将作为亚洲最大、最古老民主国家的日印紧密相连”,“两国对和平、稳定、国际法及开放的全球贸易制度负有重大责任”。^⑤

日印接近是对亚太地缘政治和权力格局新变动的回应,同时又对地区权力格局与秩序造成重大影响。日印两国都积极支持“印太概念”。对日本来说,这有利于向南亚和印度洋拓展经济与安全利益,确保海上生命线的安全,也有利于拉拢印度制衡中国。对印度来说,2014 年莫迪政府提出了“东向行动政策”,需要在印太地区扮演平衡者的角色,积极参与地区多边安全框架,实施远洋战略,发展并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防务合作关系。^⑥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在美国和日本之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战略自律性”。^⑦由于印度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印度洋这个交通要道上,在印太背景下印度很可能扮演着“左右逢源”、“两面下注”的角色。

在此基础上,安倍内阁还强化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构想,设想由日美澳印组成保卫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公海的菱形态势。^②

2014年7月8日,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成为二战后第一位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的日本领导人,将日澳同盟化关系推向新高潮。日澳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正式签署经济伙伴协定与防卫装备合作相关协议。澳大利亚公开支持日本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安倍也声称日澳开启了“特殊关系”时代。双方在政治上宣称“维护共同价值观,以及包括民主、人权、法律规则、开放的市场和自由贸易秩序”,维护“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和繁荣”,“确保各方尊重国际法、确保不受阻的贸易自由和海上、空中航线畅通无阻”;两国明确维护共同利益的手段是“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诉诸军事力量或高压政治”,在政治领域强化首脑会晤制度。^③在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中,日澳作为美国的盟友,发挥着美国岛链战略的南北双锚作用。安倍内阁深知单靠日本或者日美同盟难以应对中国的崛起,必须通过“合纵连横”串联外交和环绕外交才能对中国形成有效制约,并对冲中国加速崛起给日本带来的权势变动和不利影响。^④

日本一直想实施称霸“印太两洋”,因此以“民主”作为连接与印度合作的纽带,不断强化价值观念,实施与印度的海洋合作,同时扩大与澳大利亚的合作发展同盟关系,通过构筑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同盟来推进日本的海洋战略。

五、结 语

安倍内阁在新海洋立国理念的指导下,将日本从“被海洋守护的国家”转变为“守护海洋的国家”,更加主动地推进海洋国家战略。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实现海洋战略的方式是以日美为主轴,进一步深化日美海权同盟关系,结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日美印澳等所谓民主国家结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海上力量和国际影响扩展至太平洋和印度洋印太区域甚至世界更大的海域,最终建立起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新秩序中成为海洋大国。

注 释:

① 吕耀东、李振广:《日本海洋战略构想及其对华影响》,《唯实》,2015年第4期。

② 総合海洋政策本部『海洋基本計画』、平成25年4月、<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i-honkeikaku/index.html>。

③ 平成19年『海洋基本法』、首相官邸、<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aiyou/konkyo7.pdf>。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李秀石:《日本海洋战略对中国的影响与挑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6期。

⑦ 総合海洋政策本部『海洋基本計画』。

⑧ 同上。

⑨ 同上。

⑩ 『平成23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

ta/2011/2011/pdf/index.html。

⑪『平成 17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05/2005/pdf/index.html。

⑫『平成 23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

⑬『平成 26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http://www.clearing.mod.go.jp/hakusho_data/2014/pdf/index.html

⑭『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画(平成 26 年度～平成 30 年度)について』、http://www.mod.go.jp/j/approach/angenda/guideline/2014/pdf/chuki_seibi26-30.pdf。

⑮俞正樑:《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再平衡》,《国际观察》,2014 年第 4 期。

⑯米国連邦議会上下両院合同会議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演説「希望の同盟へ」、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4_001149.html。

⑰唐奇芳:《美日同盟强化给亚太和国际安全添堵》,《世界知识》,2015 年第 10 期。

⑱赵青海:《“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现代国际关系》,2013 年第 7 期。

⑲加藤浩三「日印関係から探るアジア地域統合」、『上智法学論集』、第 56 号、2013 年。

⑳インド国会における安倍総理大臣演説「二つの海の交わり」、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enzetsu/19/eabe_0822.html。

㉑「日インド特別戦略的グローバ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ための東京宣言」、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50478.pdf>。

㉒葛红亮:《莫迪政府“东向行动政策”析论》,《南亚研究》,2015 年第 1 期。

㉓堀本武功「冷戦後のインド外交」第 2 非同盟」と対米・対中政策」、『国際問題』、2014 年 1・2 月。

㉔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㉕朱海燕:《日澳关系“同盟化”的新发展及其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8 期。

㉖吴怀中:《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日本学刊》,2014 年第 1 期。

(秦小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令远)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

——池田大作“依正不二”生态文明观初探

汪鸿祥

内容提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现代工业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文明进步,同时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池田大作认为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贪欲和榨取是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池田大作“依正不二”生态文明观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理念。池田大作还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路径:制约人的贪欲、实行人间革命;提倡文明生活、造福子孙后代;人类同心协力,共建生态文明。

关键词 生态文明 池田大作 依正不二 人间革命

前 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纳入中国特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路径。^①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池田大作历来重视生态文明,长期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其“依正不二”生态文明观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考察:现代生态文明危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

一、现代生态文明危机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中反映人类进步与自然生存和谐程度的状态。生态文明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并在人类发展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在延续上百万年的原始社会,人类的主要生产方式是采集和渔猎,人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很低,对自然的破坏作用也很小。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对自然的被动服从为特征的共生关系,因此没有也不可能出现生态危机。早期人类生活在蓝天白云、水净河清、连绵森林、莽莽草原、繁花遍地、鸟兽成群,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环境之中。

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人类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与畜牧,人对自然的利用能力仍然低下,对自然的破坏也很有限,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部分不和谐但整体相对平衡为特征的关系,因此没有出现全面性生态危机。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佛教的“依正不二”思想,正是对人类与自然保持和谐状态的一种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

进入工业社会的两三个世纪间,尤其是在 20 世纪,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工业生产迅猛发展,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同时,对自然的破坏愈加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全面紧张充满矛盾为特征,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生态危机的重大威胁。

不可否认,现代工业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取得了巨大的文明进步,可称为人类史上的“盛世”。同时必须看到,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存亡面临严重挑战,也可称为人类史上的“危世”。可以说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是善恶并存、苦乐同行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以大量物种灭绝和全球气候变化为特征的生态危机向人类社会敲响了事关存亡的警钟!池田大作尖锐地指出:“现代文明的危机甚至会带来人类的灭绝”。^②

首先,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石油、煤炭等都是数千万年积累下来的古生物化石,是不可再生的燃料,但在工业文明发展的三个世纪间被大量开采和大量消耗。尤其 20 世纪以来,开采消费量急剧增加。有专家估计,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量只能开采数十年,煤炭也只能开采数百年。中国的资源问题也日趋紧张。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很多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耕地资源仅 0.06 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 40%。城市化过程中占用国土空间过多,耕地减少过多过快,不仅威胁到粮食安全,也威胁到国家生态安全。中国人均水资源仅 2090 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8%。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资源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将会更加明显。

其次,环境污染日渐严重。作为人类生存重要依据的空气和水受到严重污染。工业化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空气严重污染,导致地球温暖化。工业废水流入江河湖海,严重毒化水源。呼吸新鲜空气和饮用洁净水成为人类的渴望。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日渐严重,水、土壤、空气污染加重的趋势没能得到有效遏制。饮用水安全受到威胁,水源水质不合格,土壤污染面积扩大。大气污染问题更加突出,近年中国许多城市出现大范围连续雾霾天气,一些大城市雾霾污染天数接近甚至超过全年的 50%,引起国内民众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出品的调查纪实片《穹顶之下》轰动全国。改善空气质量成为中国发展中迫在眉睫的要务。形成雾霾污染的首要污染物是 PM2.5。PM2.5 来源广泛,但主要来自人为排放。PM2.5 污染本质上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因此,防治大气污染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再次,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地球上每天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物种灭绝。有专家估计,今后几十年间,可能会有数百万个动植物物种从地球上消失。中国的生态系统也在恶化。据统计,濒危动物有二百多种,濒危植物达三百多种,接近濒危的植物达四千多种。此外,森林减少、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蔓延、湖泊萎缩等问题十分严峻。

池田大作对现代生态文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他尖锐地指出:“近代西方采取的做法是‘武斗’,也就是使人与大自然对立,企图通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统制来满足人的欲望。其结果,‘欲望’变成了‘贪欲’,‘统制’也随之变成了暴力性的‘榨取’。”^③池田大作还指出:“当代科学文明是以对立处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其出发点是为了人的利益,去征服和利用自然……我认为这是当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遇崩溃的一大原因。”^④就是说,这种“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界的“贪欲”、“榨取”、“征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池田大作进一步指出:“西方文化具有的‘分析思维’的局限性,现在从自然观、生命观到政治、经济、教育等一切领域都已经显露出来了”。^⑤“西方世界逐渐培育了把人与自然分离,

客观看待自然和企图支配自然的思想。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思想成为近代科学文明发展的基础。”^⑥西方的“分析思维”“已经由人对自然的统制发展到对自然的破坏了。”^⑦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以“把人与自然分离”的西方“分析思维”为基础,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这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现代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为指针。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以自然为征服和索取的对象,牺牲自然环境求得发展,忽视自然资源的养护和再生,给生态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

池田大作针对现存的人与自然对立的生态危机问题,以大乘佛教的哲学思想为根本出发点,深刻地阐扬了佛教哲学的“依正不二”观,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理念。在池田大作与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对谈集《展望 21 世纪》中,在池田大作与季羨林教授的对谈集《畅谈东方智慧》中,池田大作多处提到“依正不二”观,对“依正不二”观做了深入的阐述。

在佛教哲学中,“依”即“依报”,指自然环境总体,“正”即“正报”,指生命主体。“依正”即为自然与人,“不二”即不可分割的一体。“依正不二”就是自然与人的一体,“依正不二”观就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关系,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池田大作明确指出:“佛教是把大宇宙、大自然与人的生命的关系当作‘依正不二’论而展开的”,“这一哲理认为,作为‘依报’的环境和作为‘正报’的人的生命,在其根本上是‘不二’的。”^⑧池田大作还指出:“佛教‘依正不二’的原理立足于这种自然观,明确主张人和自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如果把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分开对立起来考察,就不能掌握双方的真谛。”^⑨

池田大作所阐述的“依正不二”观启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与地球生态系统以至宇宙生态系统的和谐,以及各种物种之间的和谐。池田大作指出:“人本来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能不能同大自然协调、和平共处,对人类来说,是关系到生存的问题”。^⑩人与自然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源于自然而产生,赖于自然而生存发展,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人类绝对不是可以任意支配自然的“主宰”。另一方面,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人类可以适度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不断创造人类新的文明。因此,人类也绝对不是只能被动适应自然的“奴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此,人类应该成为自然的朋友。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依正不二”观与池田大作和谐理念密切相连。池田大作在其论著中经常使用“调和”一词。^⑪日文的“调和”一词就是中文的“和谐”之意。“调和”和“和谐”的英文表达都是 harmony。和谐就是万物协调发展,整体保持均衡。和谐的概念不仅表示人与人的均衡,而且表示人与自然的均衡。和谐这一概念与佛教的“缘起”思想密切相关。池田大作指出:佛教的“缘起”思想认为,“人是和大自然相互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存在的”,^⑫世上万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依存的。

现代工业社会中不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出现了危机。生态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关系产生危机的集中反映。为了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池田大作主

张将和谐理念作为 21 世纪的重要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良性互动、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境界。

池田大作所阐述的“依正不二”观还启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就是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报恩之意。正确认识到人是自然之子而非自然之主。顺应自然,就是要使人类活动符合自然规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保护自然,就是要实现人类对自然的获取和给予的平衡,在向自然获取生存和发展之需的同时,大力呵护自然,积极回报自然。

“依正不二”观还与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密切相连。^⑬池田大作生命尊严思想是以佛教生命观为基础的。佛教生命观认为宇宙的一切现象都是生命的存在。

生命尊严具有普遍性。池田大作指出:“我认为必须将生命尊严至上的价值作为普遍的价值标准”。^⑭生命包括一切,意味着包括人与地球生态系统以至宇宙生态系统的一切都是生命的存在,都具有生命的尊严。所以必须尊重自然,尊重地球和宇宙的一切生命。池田大作在强调生命尊严的同时,还强调佛教哲学的“不杀生”理念,提倡非暴力思想,就是说要在人类的每个人的心中确立不杀生的理念,善待自然,阻止人类对自然的暴力性掠夺和榨取。

生命尊严具有绝对性。池田大作指出:“只有‘生命’才是包含一切的总体,必须最优先考虑生命的尊严。”^⑮生命高于一切,意味着一切生命都是无价的、至高无上的存在。站在生命的原点上,人类和环境就能相连。所以,必须顺应自然,按照自然客观规律办事,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惩罚。

生命尊严具有时代性。池田大作提倡将生命尊严作为我们时代的共同价值理念,呼吁将 21 世纪作为“生命的世纪”。^⑯现代社会中,糟蹋生命的现象屡见不鲜,损害生命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仅对人的生命不珍惜,而且对自然的生命也不珍惜。如滥捕动物、滥伐植物,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在“生命危机”的现代社会,理解生命的真谛,确立生命尊严的理念,珍惜一切生命,珍爱自然,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池田大作指出:“所谓生命的尊严在于自己的心中承认所有的生命尊严。”^⑰就是说不仅要认识自己生命的尊严,而且要认识一切生命的尊严,尊重生命意味着必须保护自然,必须爱护一切生命,必须建设生态文明。生命尊严和生态保护不仅应该成为个人思考和行动的准则,而且应该成为国家和政府制定法律政策的准则,也应该成为国际社会交流与合作的准则。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

池田大作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的路径进行了精辟的论述。

1、制约人的贪欲,实行人间革命

人对自然的贪欲是造成现代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制约人的贪欲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路径之一。

池田大作指出:“给欲望以无限制的自由,就等于压制了崇高精神的自由。因为欲望必然要破坏崇高精神。”^⑱就是说,必须限制人的欲望,因为放纵人的欲望就会破坏崇高精神。人的贪欲可能造成各种恶果,会导致思维上的近视,会使人利欲熏心、见利忘义。人的贪欲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限制贪欲培养人的崇高精神。为此,池田大作指出:“必须将能够贤明

地指导欲望的理性和道德律在人们的生命中内在化……为了在自己的生命中实现这个理想,向自我变革进行挑战,从而将自身的尊严性从单纯一般的原理转换为具体的现实。”^⑩就是说,必须实现理性和道德律的生命内在化,为此需要进行自我变革的挑战,确立能够指导自己的自律精神。这种自我变革或自律精神的确立,说到底就是进行人间革命。

人间革命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革命,就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变革,也就是人的修行、人的自身修养。池田大作深刻地阐明了实现人的内在变革的关键是从善,引导人们节制本能,限制欲望,修善积德,以实现人的内在的变革。通过个人这一“小我”的人间革命,进而实现“大我”的人间革命即实现全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池田大作指出:“一个人的伟大的人间革命,不久将会实现一国的命运的转变,进而可能转变全人类的命运。”^⑪这一论述实际上指明了实现21世纪生态文明的根本途径就是实行人间革命。

2. 提倡文明生活,造福子孙后代

大自然是人类的生命支持系统,不仅哺育我们祖先,而且还要养育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不仅对现代人类造成重大危害,而且对子孙后代造成重大危害,破坏了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

池田大作尖锐指出:“长此下去,积重难返,就剥夺了子孙后代的生存权。”^⑫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加强这种认识,人类才能在现代社会中自觉确立自己的生活方式”,^⑬并提出:“要将物质的消费控制在最低限度,尽可能地再生使用废物。”^⑭就是说生态危机可能剥夺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必须树立造福后代的观念,必须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不能为了我们这一代的需要而剥夺子孙后代生存的权利,更不能让子孙后代承担我们这一代过度使用资源和破坏环境的恶果。

基于这种认识,必须确立文明的生活方式。确立文明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日常生活行为看似小事,实则是关系生态文明的大事。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会对资源、环境、生态造成各种影响,所以,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有责任从自己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控制消费,遏制浪费,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保护生态,美化环境,努力消除有害生态环境的因素,积极增加有利生态环境的因素。联合国曾经发出警告:“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且是借用了子孙的地球”。必须重视生态的代际公平,维护自然资源对人类长远供养的能力,形成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使子孙后代具有生存和发展的公平机会,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世代相传。

3. 人类同心协力,共建生态文明

池田大作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行”,出现了“全球性的问题群”。^⑮所谓“全球性的问题群”,是指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区域界限,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生态危机就是全球性问题之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和挑战。生态危机问题具有全球性的特点,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

池田大作针对生态危机问题具有全球性的这一特点,明确提出:“科学家应当利用其学识启迪广大民众。新闻工作者应当拿起笔来无情地揭露罪恶。家庭主妇对家庭有关的问题要能够进行斗争。工人们还可以从企业内部进行揭露”。^⑯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是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重大课题,建设生态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人类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积极行动,同心协力,共建生态文明,共同营造人类美好家园。

共建生态文明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必须通过教育增强人类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风气,创造新的生态文明价值,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共建生态文明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节约利用资源,推进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共建生态文明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必须确立生态保护的长期稳定的有效制度,依靠制度力量规范社会行为,鼓励生态保护,惩治生态破坏。

共建生态文明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对话和合作。^⑨应该发挥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调动人类社会的各种积极力量,群策群力,共同解决人类的共同课题,共同建设人类的美好家园。在生态保护方面,日本的大气污染治理具有参考价值。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空气污染事件频发。1968年日本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70年制定了大气环境质量标,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70年代后半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从工业污染转向城市汽车尾气污染,通过制定有关标准和开发控制技术,大大减轻了汽车尾气污染。日本在工业烟气除尘和汽车尾气净化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应该吸取日本大气污染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促进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进程。

结 语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根基和条件,是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面对自然资源日趋匮乏、环境污染日渐严重、生态系统日益恶化等生态危机的重大威胁,必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池田大作所阐扬的“依正不二”生态文明观对我们建设21世纪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我们不仅要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要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也不是自然的“奴仆”,而应该是自然的朋友。“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我们要珍爱自然,善待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同开创21世纪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注 释:

①《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19日。

②池田大作、季羨林、蒋忠新:《畅谈东方智慧》,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第2页。

③《畅谈东方智慧》,第198页。

④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3卷,圣教新闻社,1991年,第85页。

⑤《畅谈东方智慧》,第218页。

⑥《畅谈东方智慧》,第236页。

⑦《畅谈东方智慧》,第214页。

⑧《畅谈东方智慧》,第232-233页。

⑨池田大作、汤因比:《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0页。

⑩《畅谈东方智慧》,第232页。

⑪据统计,仅《展望21世纪》一书,至少有36处使用“调和”二字。参见《与池田大作对话文明重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1页。

⑫《畅谈东方智慧》，第 195 页。

⑬汪鸿祥：《泛论池田大作的生命尊严思想与实践》，《走向 21 世纪的生命尊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86—201 页。

⑭同上。

⑮池田大作：《池田大作全集》第 1 卷，圣教新闻社，1988 年，第 471 页。

⑯池田大作、卡勒鲁奇：《文明——西方与东方》，《池田大作全集》第 102 卷，圣教新闻社，2003 年，第 20 页。

⑰《池田大作全集》第 1 卷，第 471 页。

⑱《展望 21 世纪》，第 57 页。

⑲《池田大作全集》第 1 卷，第 476 页。

⑳池田大作：《人间革命》第 1 卷，圣教新闻社，1965 年，第 3 页。

㉑《展望 21 世纪》，第 56 页。

㉒同上。

㉓《展望 21 世纪》，第 58 页。

㉔《畅谈东方智慧》，第 271 页

㉕《展望 21 世纪》，第 58—59 页。

㉖汪鸿祥：《文明对话与国际关系》，《多元文化与世界和谐》，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87—100 页。

（汪鸿祥：日本创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上接第 60 页）

同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1 年第 1 期；张彧：《在共识中构建历史认知：读〈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新京报》，2015 年 2 月 16 日，第 B06 版，等等。

③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二〇《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210 页。

④详细的文本对比请参看拙稿：《关于〈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的史源问题》，《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 年第 2 期。

⑤参看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四节“东洋近世的国民主义(Nationalism)”，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 年，第 207—208 页。

⑥成寻：《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第四，熙宁五年十月十五日己丑条，王丽萍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12 页。

⑦舍人亲王总裁：《日本书纪》卷三十《持统传》持统天皇六年(691)闰五月己酉条记载：“诏筑紫大宰率河内王等曰：‘宜遣沙门于大隅与阿多，可传佛教。复上送大唐大使郭务悰为御近江大津宫天皇所造阿弥陀像’”（吉川弘文馆，1986 年，第 415 页）。“御近江大津宫天皇”即是天智天皇。

⑧田村圆澄「大唐学问僧の帰国と蘇我氏の滅亡」、『東アジアの古代文化』、第 88 輯；又载其『古代東アジアの国家と仏教』、吉川弘文馆、2002 年。

⑨据统计，1979 年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学者关于日本古代史、中世纪史的专著仅 8 本，占日本史研究著作总数 162 本的 4.9%；同时期中国学者关于日本古代史、中世纪史的学术论文为 244 篇，占日本史研究论文总数 1849 篇的 13.2%。数据参见李玉：《古代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中国日本史研究：以日本史研究论著数量统计为中心》表 1、表 2，载其主编《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370、371 页。

（马云超：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令远）

“总体战”的逻辑困境与日本知识人之应对

——“近代的超克”再解读(1941—1945)

魏灵学

内容提要 所谓“近代的超克”，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狭义的“近代的超克”，是指昭和 17（1942）年发生的、一场由《文学界》召集、京都学派与日本浪漫派参与、为战争寻找理论支撑的知识人座谈；广义的“近代的超克”，是指发轫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日本知识界的一种松散的思潮，而 1941 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正是两者的衔接点。参与到“近代的超克”（座谈或思潮）之中的知识人，正是在“战时体验”这一大语境下展开了行动。

昭和日本的“战争体验”，其表现形式即“总体战”制度下的对外侵略战争。而深陷其中的日本知识人面临着两个逻辑悖论，一方面，国民战争强制性地将每一个人纳入战争轨道，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矛盾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战争的对外侵略性与国家道义性之间存在张力。“近代的超克”正是要解决这两组悖论。京都学派的西谷启治在继承其师西田几多郎国体论的基础上，通过否定作为西方伦理基础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翼赞”奠定了哲学基础，竹内好则通过敌化西方，使日本由侵略者向解放者转型，从而为所谓的“亚洲共荣”确立了道德依据。

关键词 总体战 近代的超克 京都学派 竹内好

绪论：“近代的超克”的概念辨析

所谓“近代的超克”，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视域。^①

狭义上“近代的超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是指昭和 17（1942）年，一场由《文学界》^②召集、京都学派^③与日本浪漫派^④参与的、为战争寻找理论支撑的知识人座谈，以及于当年 9 月、10 月刊载的《文化综合探讨会》。^⑤昭和 18（1943）年，创元社以“近代的超克”为名将其出版刊行。

从附表中与会者身份之复杂、研究领域之差异不难看出，虽然这次座谈“实际上未能取得任何的结论或共识”，^⑦但它确实代表了当时日本诸多知识人的某种共有的倾向，这便涉及到了广义上的“近代的超克”。

广义的“近代的超克”，是一组模糊的观念单元，是指发轫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日本知识界的一种松散的思潮（或曰思维定向）。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知识人之思想呈现出一种“钟摆式的变动”——松本三之介将其概括为“国权与的民权变奏”，^⑧三谷博将其总结为“爱国与民主的问题”^⑨——其本质，即西方（个人主义）伦理与日本（皇国主义）思维的较量。步入昭和时代后，随着日本国内外政治格局的变动，出现了所谓“‘超进步’的思想与政治上反动倾向相结合的滑稽现象”。^⑩而 1941 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正是两类“近代的超克”的衔接点。20 世纪 30 年代以降，在日本思想界，各式各样的“超进步”思潮已然兴起，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对其加以概括——正是通过这场座谈，“近代的超克”作为一个“概念”被建构出

表 1 1943 年创元社版文集参与者^⑥

与会人	当时的身份	收录的文章
龟景胜一郎(1907-1966)	“日本浪漫派”代表人物,“文学界同人”文艺评论家	《现代精神备忘录》
西谷启治(1900-1990)	京都学派哲学家,京都帝国大学副教授	《“近代的超克”私论》
诸井三郎(1903-1977)	音乐评论家,东洋音乐学校和东京高等音乐院讲师	《吾等之立场》
吉满义彦(1904-1945)	哲学家,天主教神学家,东京帝国大学讲师	《“近代超克”之神学根据》
林房雄(1903-1975)	《文学界》文艺评论家	《勤王之心》
下村寅太郎(1902-1995)	京都学派科学史学者,东京文理科大学教授	《“近代的超克”之方向》
津村秀夫(1907-1985)	电影评论家,《朝日新闻》记者兼文部省专员	《应该打破何物》
三好达治(1900-1964)	《文学界》诗人,明治大学讲师	《略记》
菊池正士(1902-1974)	物理学者,大阪帝国大学教授	《关于“科学的超克”》
中村光夫(1911-1988)	《文学界》文艺评论家	《对于“近代”的疑惑》
河上徹太郎(1902-1980)	《文学界》文艺评论家	《“近代的超克”结语》
铃木成高(1907-1988)	京都学派西洋史学家,京都帝大助教授	
小林秀雄(1902-1983)	《文学界》文艺评论家,明治大学教授	

来,并成为这股思潮的统称,这使得思想的“一齐化”成为可能,正如丸山真男回忆道:“在1940年之后的时代氛围中,不只是军部、‘革新官僚’、反议会主义政治家,还有从左翼转变过来的知识分子一起领唱道:‘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打倒由英、美、法等国所代表的已落后于时代的自由主义诸观念,协助日本、德国与意大利等轴心国家在前列所进行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设。’”^⑩

上述引文中所谓“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即以“总体战”思想为指导的“大东亚建设”。^⑪昭和13(1938)年中日战争呈现持久化态势后,日本当局在经济统制方面已经采取了系列举措。是年4月1日,日本统治当局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赋予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近乎无限的权力。^⑫昭和15(1940)年10月12日,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大会上,时任日本首相的近卫文麿在讲话中称:“政府奉戴圣旨,顺应国际大局,并为完善高度国防的国家体制而竭尽所能”。^⑬而这种“总体战”面临着两个逻辑悖论:一方面,“国民战争”强制性地将每一个人绑上了名曰“大日本帝国”的战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矛盾日益凸显,此即“国民与国家”之悖论;另一方面,昭和战争作为一种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侵略与破坏,道义何在,此即“日本与亚洲”之悖论。而“京都学派”的代表、“近代的超克”会议与会者之一西谷启治的论述正是针对前者展开的。

一、京都学派与“世界史”哲学:“个人与国家”的逻辑悖论

承上所述,欲理解西谷之“近代的超克”,必要先对其理论基础——“西田哲学”进行概略性地解读。^⑭

1. 西田几多郎及其哲学

所谓“西田哲学”,即以西田几多郎为核心的学者所开创的哲学流派。昭和11(1936)年末,西田几多郎担任了“日本诸学术振兴委员会”所办演讲会的讲师,进行了题为“日本文化

表2 西田几多郎的东西文化比较论^①

	西方文化	东方文化
来源	古希腊	(古代)中国、印度
属性	“空间的、知性的、有形的” (“有”的文化)	“时间的、情义的、无形的” (“无”的文化)
逻辑对象	“物” “科学者视现实作物”	“心” “佛学者视现实作心”
结论	东方与西方在文化、思维上存在巨大差异,然而东方文化绝不低于西方文化	

的问题”的系列演讲,后于昭和 15(1940)年由岩波书店结集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西田几多郎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系统性的比较。

这一时期西田所谓“日本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有着两个基本点:其一,“文化多元主义”,即在西方(或说欧洲)文化之外,还存在着足以与之抗衡的、由古代中国与印度发源而来的东方文化,此即小坂国继所谓“(西田)面向世界的文化观”。^⑥其二,在多样性的文化体中,日本文化优越性的根基在于天皇制,“吾等所为皆是源于皇室、亦归于皇室,此必是‘万民辅翼’之思想,因此,所谓我国国民之道德,必是建设历史性的世界”。^⑧

与此同时,以这种文化观为基础,西田的国家观有三个延伸点:其一,“国家”的定义,“所谓国家,必是作为绝对矛盾自我同一的、历史世界的、有个性的自我形成,必是一个有个性的世界”。^⑨其二,“国体”的定义,“国体即国家之个性,国家有国体方可称之为国家”,^⑩“国体,作为超越即内在、内在即超越的世界性的形成,必是宗教的,否则它就不能成为道德的根源”。^⑪其三,日本的独特性在乎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国体”,“严谨地说,所谓国体,我国之外的国家是没有的”,^⑫“我国国体之中,皇室乃世界始终,皇室作为绝对现在的自我限定,包含着过去与未来,一切都是以皇室为中心生生不息发展的,斯为我国国体之精华”。^⑬

西田哲学的本质在乎“尊皇”,这与当时日本政要之需可谓是不谋而合。昭和 14(1939)年 2 月,西田几多郎应原田熊雄之邀,与原藏相池田成彬、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海军大佐高木惣吉进行了会谈,高木将之概括为“关乎日本精神、帝大肃学、对支那文化工作、军人政治、战争与政治、英美舆论与联动德意两国等诸问题的座谈”。^⑭昭和 16(1941)年 1 月 23 日,西田为天皇进行了长达 30 分钟的演讲,“(这是)哲学第一次被安排在为天皇讲书的仪式之内”。^⑮可以说,正是西田的巨大名望促使政府与“京都学派”深化了合作。“珍珠港事件”前 13 天,京都学派哲学家召开了“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主题座谈,西谷启治作为此座谈的与会者之一,显然将西田哲学的“立场”带入了“近代的超克”会议之中。

2. 西谷启治及其“近代超克”论

西谷启治对“近代”展开了抨击,他指出:“一般而言,所谓‘近代’,就是欧洲的东西。无论是政治或是经济,‘近代’乃是在中世纪结束之后、欧洲向世界扩张的过程中出现的。而日本社会中所所谓的‘近代’,亦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所输入的欧洲理念的基础之上形成的。”^⑯

这段引文隐含着三层含义。其一,“近代=西方”,“近代”作为一个时间与空间结为一体的概念,乃是欧洲(即西欧,下同)的历史产物。其二,“近代”是欧洲向世界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因此扩张(侵略)性乃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其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便是欧(西)化的过程,因此,一切“近代病”的根源都在于此。他接着写道:“若视个人于世界中独立

存在之权利为自由主义的根本,便可理解为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合二为一的立场。针对此,便衍生出诸如彻底的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与这三者相对立的绝对国家主义等等,这样一来,个人、国家和世界的关系便可谓混乱不堪矣。”^②

很显然,西谷启治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西方文化的伦理基础,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两个“经常被混用但存在着巨大差异的概念”,^③而西谷的批判正是根据这种“混乱”生发的。他认为,作为西方伦理价值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在世界中的独立权利(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世界主义”),这没有真正理清个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以至于诸多迥然不同的政治主张被衍生出来,而个人、世界、国家三者逻辑关系也变得异常混乱。据此,他“超克”了西方(近代)式的自由主义,并论证了“日本式自由主义”的优越性:“东方的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每个人努力做好工作,奉公灭私,消除掉随意散漫的、利己主义的小我。”^④

3. 小结

西田几多郎与西谷启治思想的内在联系,正是两类“近代的超克”的衔接逻辑。20世纪30年代后期,西田几多郎的理论已然体现出“超进步”的思维,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亦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国家;而“国家”之所以为“国家”,在乎其要具有区别于“他者”的“特质”,即“国体”;就日本而言,国体即是“万世一系之天皇”,而这亦是日本“超越”西方的根源所在。

西田几多郎以“国体”为角度论证了日本的优越性,但却只是在单方面地论证日本的“独特”,“所谓国体我国之外的国家是没有的”这种解释有一种浓厚的本质主义倾向——因为有国体,所以超过欧洲。

西谷启治显然更进一步。他将欧洲的“国体”定位到了居于其伦理根基位置的“自由主义”,然后又利用欧洲“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逻辑矛盾对其加以批判,与此同时,“近代=欧洲”的建构,即意味着存在于日本思想界的那种“强调个人的自由主义”乃是欧洲的产物,既然这种“欧洲式的自由主义”本身便是错误的,它便应当被“东方的、灭己奉公的自由主义”取代——在这里,“超越欧洲=克服近代”便成为了一体性的概念,而前文所述“总体战”体制带来的“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逻辑悖论亦迎刃而解矣。

换言之,京都学派的“近代的超克”论,与实际面临的“战争体验”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体验亦是昭和知识人所共有的,正如竹内好回忆道:“我们这一代人共有一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体验”。^⑤

二、竹内好与“大东亚”思维:“日本与亚洲”的逻辑悖论

与“近代的超克”与会者之一的西谷洋启治不同,竹内好在日本思想史上是以“‘近代的超克’的批判者”的姿态存在着,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却写出了与其倾向完全相悖的、充满“狂气”的《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意》——孙歌称之为“一次失足”,^⑥鹤见俊辅称之为“(竹内)战后反省论的起点”。^⑦因此,我们必须在对竹内好思想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以他为代表的一类日本知识人在战争期间的思维方式。

1. “鲁迅与自我否定”:竹内好的思维模式^⑧

对于竹内好在日本思想史上的“独特”,日本学者佐藤美奈子评价道:“竹内好是一个奇

妙的思想家……当那些与他同时代者难逃随着时间褪色的宿命而被逐渐遗忘的时候，思想家‘竹内好’的名字却始终在耳边。”^③对于竹内好这种“思想家”的特质，中国学者孙歌对此亦深有感触，她指出：“竹内好是一位非常特别的日本思想家，他的特别之处在于难以定位……但他本人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也不曾以学院派的方式工作。”^④

孙歌所谓“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者”可以说高度概括了竹内好治学的特色。明治 43 (1910)年，竹内好出生于长野县，昭和 6(1931)年 4 月，竹内好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研究科。昭和 7(1932)年 8 月 7 日至 10 月 8 日，竹内进行了第一次中国旅行，“对于中国的情结便是从此时开始的”。^⑤昭和 9(1934)年，竹内完成论文《郁达夫研究》，成为同期学生中唯一以同时代的中国文学家为研究对象的毕业生。^⑥全文分为四大部分，即序言、考证研究(略历、著作、年表)、郁达夫论(苦闷的诗人、为人之苦、社会之苦、时代之苦)与结语。^⑦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写道：“郁达夫，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苦闷是同时代青年的社会性苦闷的集中体现，中国社会的急速进化并未使他的苦闷延续至今，在转折的时代里，他并未跃入新苦闷的漩涡，而是固守自身的道路，从而摆脱了苦闷。”^⑧

在这篇论文中，竹内已经建构起“文学家－文学－社会”的分析结构，而“进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则反映出竹内对转型期间的中国社会的某种思考，换言之，是对“近代”冲击之下的亚洲知识人的某种思考。^⑨昭和 11(1936)年 10 月 19 日，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本计划以“鲁迅特集号”方式推出的《中国文学月报(第 20 号)》也临时作了调整。^⑩对于这次“死亡”，竹内好在其成名作《鲁迅》中追忆道：^⑪“鲁迅度过的文坛生活的十八年，在时间上来说并不长，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那是中国文学的全部历史……从‘文学革命’以前一直到结束，幸存者只有鲁迅一个。鲁迅的死，不只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死，而是一个现存文学家的死。把鲁迅称作‘中国的高尔基’，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为什么鲁迅能够获得这么长的生命力呢？因为鲁迅不是一个先觉者。”^⑫

而竹内认为，鲁迅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原因之一在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精神”，他写道：“我认为，有鲁迅那样的启蒙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是值得夸耀的。但是，作为文学家向作为启蒙者的自己进行反叛的鲁迅，却是比启蒙者的鲁迅更为伟大。”^⑬“‘绝望之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那么，与其说因此之故《狂人日记》的作者作为小说家不能发展，不如说，因为背离了自己的小说而应该为自己的作品赎罪。”^⑭这种“自我否定”的价值，其本质正是强调“超越与克服”，这与“超进步”思潮极为相似，而日美战争的爆发，使得竹内的这一思维进一步延伸开来。

2.“西方与亚洲解放”：竹内好的“近代超克”论

昭和 16(1942)年 1 月(即“突袭珍珠港”次月)，竹内好于《中国文学》第 80 号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研究宣言《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意》(下文简称《决意》)，他在其中点明了“自我否定”的现实意义：“现实实在是太明确、太强大了，我们无法否定。我们否定的只是我们自身。”^⑮

一个问题在于，《鲁迅》一书完成于昭和 18(1943)年、初版于昭和 19(1944)年，而《作为思想者的鲁迅》和《略年谱》更是在昭和 24(1949)年完成、在昭和 27(1952)年加入到创元文库版，^⑯所以说，竹内好的这篇《决意》早于《鲁迅》，那么怎可谓“鲁迅的‘自我否定’精神”影响到了《决意》的写作呢——解决这一时间悖论的要点在于：我们要把竹内好写作与思考的时间向前延伸。首先，关于这部著作的性质，竹内好明确使用了“这本札记”^⑰的说法，因此其中的文字与思想可谓是竹内之前“零散思考”的一个“汇总”；其次，这个“零散思考”的时间维

度,竹内亦给出了暗示,“我从自己专攻中国文学的立场出发,十年来一直持续保持着对鲁迅的兴趣”。^⑨因此,《鲁迅》与《决意》两件文本在思维模式上并不存在时间先后的悖论。

《决意》中的“自我否定”,本质在于竹内好“超克”了自身对于战争(尤其是日华战争)的认识,当“支那事变”(中国称“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绝望与毁灭,他感认为“北京的文化已然死去了,至少是在井然有序地安睡着”。^⑩而在《决意》中,这种对于“支那”的“负罪感”依然十分强烈,“坦率而言,我们对于支那事变有着完全不同的感情……我们热爱支那……支那事变爆发,这种确信土崩瓦解,被无情地撕裂开来”。^⑪然而,太平洋爆发这一“现实”,促使竹内好否定了这种负罪感,并使其确信了“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他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们埋没了圣战的意义。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建设东亚的美名之下欺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于今日已经转换成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⑫

总言之,在这篇文章中,“超克西方”乃是整个亚洲的历史任务,因此,日本对于亚洲各国的侵略乃是一种所谓“与东亚国家携手解放自身的圣战”,他写道:“从东亚驱逐侵略者,对此我们没有一丝一毫需要反省的必要……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我们热爱支那,我们与支那携手共进……今日我们基于对东亚解放战争决意,重新否定了曾经自我否定的自己……诸君,现在我们要在新的决意之下进行战斗。诸君,让我们并肩战斗吧!”^⑬

3. 小结

竹内好通过对中国文学(尤其是鲁迅)的研究,建构起“自我否定”的思维模式,而其构造与强调“超越与克服”的“超进步”思潮极为相似,然而,对外(华)战争却使得这种思维模式陷入了道义上的困境——日本的“超进步”,是以侵略乃至破坏中国为代价的。

太平洋战争促使竹内好“否定了”他“否定(对华)战争的自身”。对英美战争的展开,让竹内好看到在“中国-日本”这一敌对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亚洲-西方”这样一个“更大的”敌对关系。这种思考模式与西田几多郎在构造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西田强调之处在于“文化”层面上的敌对关系。因此,“近代的超克”不仅仅是日本的当前任务,更是整个亚洲的历史宿命,继而,太平洋战争使得“支那事变”完成了“对于中国的侵略破坏”向“协同亚洲超克近代”的意义转换。

尾 论

正如科林伍德指出,政治思想研究的关键在于一种“问题逻辑”,即“某某人想要把这一命题作为什么问题之答案”。^⑭以此为视角,笔者提出本文暂定之结论:

其一,所谓“近代的超克”,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界定。狭义的“近代的超克”,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广义的“近代的超克”,是一组模糊的“观念单元”(Unit Idea)^⑮或曰“思维定向”。而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正是两类“近代的超克”的衔接点,20世纪30年代以降,在日本思想界,各式各样的“超进步”思潮已然兴起,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来对其加以概括。正是通过这场座谈,“近代的超克”作为一个“概念”被建构出来,并成为这股思潮的统称,进而使得当时思想的“一齐化”成为可能。

其二,参与到“近代的超克”(座谈或思潮)之中的各领域知识人,其政治思想本身便是其

社会行为的一方面——即“智识”的一方面。^⑤他们的“文本”，正是在“战时体验”这一大“语境”下展开的“行动”。

其三，昭和日本的“战争体验”，其表现形式即“总体战”制度下的对外侵略战争，而深陷其中的日本知识人面临着两个“逻辑悖论”。

其四，参与到“近代的超克”之中的日本知识人，其目的正是要解决这两组悖论。京都学派的西谷启治，在继承其师西田几多郎“国体论”的基础上，通过否定作为西方伦理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翼赞”树立了哲学基础；竹内好则通过“自我否定”的逻辑，使日本由“侵略者”向“解放者”转型，从而为所谓的“亚洲共荣”确立了道德依据。

注 释：

①日本学界针对“近代的超克”问题的研究综述，可参见陈都伟：《丸山真男论的诸相》，《世界哲学》，2005年第5期；拙作：《天平两端的丸山真男》，《日本研究集林》，2012年上半年刊。

②《文学界》系近代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创作与文艺评论杂志之一。明治26(1893)年1月，《文学界》于《女学杂志》中独立出来并发行了创刊号，最初参与者包括岛崎藤村、北村透谷等。杂志于明治31(1898)年1月一度废刊。昭和8(1933)年10月，杂志由小林秀雄、林房雄等人复刊。

③所谓“京都学派”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严格来讲，所谓的‘京都学派’，它有哲学意义与东洋史学意义两大理解……所谓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是指以京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代表，包括以其思想为基础、和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日本传统思想及其在现在的转化和发展的一个日本哲学学派……所谓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是指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狩野直喜、桑原鹭藏与内藤湖南为代表，包括以他们的学术观点为基础、和他们有着师承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与文学的一个日本汉学派。”参见刘正：《京都学派》，中华书局，2009年，第27-28页。

④所谓“日本浪漫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日本文学界的一种思想倾向，主要代表人物包括保田与重郎、神保光太郎、龟井胜一郎与中谷孝雄等，他们主张“回归日本传统”、“以古代赞歌为支柱对近代展开批判”。参见奥出健「日本浪漫派の誕生とその反響」、横浜女子短期大学編『研究紀要』、1985年4月30日、1-17頁。

⑤《文学界》1942年9月号刊载西谷启治、诸井三郎、津村秀夫、吉满义彦四人文章，10月号刊载龟井胜一郎、林房雄、三好达治、铃木成高、中村光夫的文章，次年7月结集出版单行本并有文章增删。关于此次会议经过及刊载文集的详细信息，参见今野昌信「『近代的超克』論」と近代科学論への一考察」、『高崎経済大学論集』、57-3、2014年、24頁；竹内好：《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303页。

⑥表格整理依据河上徹太郎編『近代の超克：知的協力会議』、創元社、1943年。

⑦河上徹太郎(ほか)『近代の超克』、富山房、1979年、172頁。

⑧参见松本三之介『明治精神の構造』、岩波書店、1993年。

⑨参见三谷博『愛国・革命・民主：日本史から世界を考える』、筑摩書房、2013年。

⑩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23-24页。

⑪《英文版作者序》，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研究》，王中江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18页。

⑫关于日本学界针对“总体战”问题的研究综述，可参见冯玮：《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第155-166页；姚春海：《日本总体战体制形成研究》，吉林大学世界史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5页。

⑬冯玮：《日本通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70页。

⑭下中弥三郎編『翼賛国民運動史』、翼賛成運動史刊行会、1954年、138頁。

⑮关于西田哲学与“近代的超克”之间的关系，日中两国学者的研究视角有着明显的差异。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两者的“差异性”。例如荒井正雄认为，“西田哲学中对‘近代的超克’起到影响作用的仅仅是

‘世界史的使命’，可以把‘近代的超克’作为‘臭名昭著’的战争助从论进行批判，但却不能将其视为‘正统的西田哲学的展开’。”参见荒井正雄『西田哲学読解：ヘーゲル解釈と国家論』、晃洋書房、2001年、124頁。鈴木亨则认为，“应当把西田哲学和战争期间鼓吹、协助战争的‘西田哲学的亚流’区别看待。”参见鈴木亨『西田幾多郎の世界』、勁草書房、1988年、83頁。而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两者的“共通性”。例如吴玲指出，“不论是对日本国家的‘道义的生命力’的解读，还是对太平洋战争的认识，‘近代的超克’论和‘京都学派’哲学家的视角、思想倾向、哲学逻辑和方法论几乎都来源于西田哲学。”参见吴玲：《西田几多郎与“近代的超克”》，《北方论丛》，2013年第3期，第81页。

①⑥表格整理依据西田幾多郎『日本文化の問題』、岩波書店、1982年。

①⑦小坂国継『西田哲学と現代：歴史・宗教・自然を読み解く』、ミネルヴァ書房、2001年、40頁。

①⑧西田幾多郎『日本文化の問題』、80-81頁。

①⑨竹田篤司(ほか)編『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9巻』、岩波書店、2004年、336頁。

②⑩竹田篤司(ほか)編『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11巻』、岩波書店、2005年、197頁。

②⑪竹田篤司(ほか)編『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11巻』、205頁。

②⑫竹田篤司(ほか)編『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11巻』、202頁。

②⑬竹田篤司(ほか)編『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11巻』、201頁。

②⑭竹田篤司『物語「京都学派」』、中央公論新社、2001年、171頁。

②⑮西田書簡1531、「書簡集：昭和13年～昭和20年」、安倍能成(ほか)編『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19巻』、岩波書店、1989年、145頁。

②⑯西谷啓治「近代の超克」私論、竹内好、河上徹太郎『近代の超克』、筑摩書房、1983年、18-19頁。

②⑰西谷啓治「近代の超克」私論、21頁。

②⑱参见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

②⑲西谷啓治「近代の超克」私論、26頁。

③⑩竹内好：《关于战争体验的一般化》，《近代的超克》，孙歌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238页。

③⑪参见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③⑫参见鶴見俊輔『竹内好：ある方法の伝記』、リブポート、1995年、129頁。

③⑬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竹内好虽然是日本鲁迅研究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但是鲁迅作品输入日本以及日本知识人的回应应在竹内好之前就已然开始了。关于此问题，参见徐泽：《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第4-7页。

③⑭佐藤美奈子「『アジア』を語るということ——1980年代以降の竹内好論」、『特集1990年代日本の思想変容』、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編『社會科學研究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紀要』、59-1、2006年、47頁。

③⑮孙歌：《竹内好的悖论》，第15页。

③⑯猪野謙二(ほか)監修『竹内好全集』巻5、筑摩書房、1981年、25頁。

③⑰参见佐々木渥「竹内好と鲁迅、毛沢東」、長野大学紀要編集委員会編『長野大学紀要』、29-2、2007年、45頁。

③⑱参见竹内好「郁達夫研究」、『竹内好全集』巻17、筑摩書房、1982年。

③⑲竹内好「郁達夫研究」、160頁。

④⑩“进化”(evolution)初为生物学用词，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指出，“进化论”(evolutionary)与“进步”(progress)两个概念于东亚在地化的过程反映出西学东渐下东方知识人思维模式的反应与变动，参见 Andrew F. Jones,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⑪《中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研究会于昭和10(1935)年2月开始发行的刊物，团体以竹内好、武田泰淳等人为核心，杂志主要内容包括：同时代中国文学介绍与评论、中国古典文学介绍、“汉学”评论、中国语言相关问题、报告、他国的中国研究、同时代中国文化界动向等。参见朱琳「近代日本知識人にとっての『支那語』の多

重的意味：雑誌『中国文学月報』（『中国文学』）を中心に」（講演）、2013年10月、<http://nippon-chugoku-gakkai.org/utf8/jisedai/02/shurin.pdf#search=%E7%AB%B9%E5%86%85%E5%A5%BDpdf>。关于“中国文学研究会”，参与者之一的松枝茂夫记录道：“（这是一个）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为目的而结成的社团，于昭和9（1934）年由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峻夫三人创立。继增田涉、松枝茂夫之后，实藤惠秀、千田九一、饭冢朗等人亦参加进来，其后小野忍、斋藤秋男等同人也加入。这些人除实藤、斋藤二人外，都是东大支那哲文科出身，他们反对僵化了的东大的汉学，与那时学界未曾有人关注的活生生的现代中国文学相遇，为求‘文学’的真谛而苦斗。”参见日本近代文学館編『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卷4、講談社、1977年、284頁。

④国内学者通常将《鲁迅入门》作为“写于战前的《鲁迅》在战后的延伸”，然而日本学者尾崎文昭指出，从《鲁迅》到《鲁迅入门》，竹内好的鲁迅观及以此为核心的理论结构有着深刻的变化。参见尾崎文昭：《从〈鲁迅〉到〈鲁迅入门〉：竹内好鲁迅观的变动》，《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期，第91-96页。

④③竹内好：《序章——关于死与生》，《鲁迅》，李心峰译，浙江新华书店，1986年，第7-8页。

④④竹内好：《关于传记的疑问》，《鲁迅》，第15页。

④⑤竹内好：《关于作品》，《鲁迅》，第81页。

④⑥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近代的超克》，第165-167页。

④⑦竹内好：《创元文库版后记》，《近代的超克》，第156-158页。

④⑧竹内好：《关于作品》，第104页。

④⑨竹内好：《有关传记的疑问》，第16页。

⑤⑩竹内好「北京日記」、『竹内好全集』卷15（日記上）、筑摩書房、1981年、109頁。

⑤⑪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第166页。

⑤⑫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第166页。

⑤⑬竹内好：《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第167-168页。

⑤⑭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39.

⑤⑮关于所谓“观念单元”（Unit Idea）这一词汇的界定及其在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应用，参见Stefan Collini, Quentin Skinner etc., “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Today*, Vol. 35, No.10, 1985.

⑤⑯关于政治思想的“智识”性质，参见J. G. A. Pocock,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 Methodological Enquiry,” in Peter Laslett and W.G. Runciman eds.,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62.

（魏灵学：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徐静波）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开拓之作

——读《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

马云超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①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第一阶段的成果报告,分为“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两册,中文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项目自2006年12月正式启动,至2010年1月公布研究报告,历时三年,由步平教授和北冈伸一教授(以下省略敬称)分别担任中日首席委员。作为首次由两国学者依据政府间协议从事研究的成果,报告自发表以来广受关注与好评。^②然而,社会各界主要把眼光投向了“近代史卷”,同为研究成果的“古代史卷”则少有问津。笔者近日拜读“古代史卷”,思考与启示颇多,愿不揣鄙陋,将各中感想与读者分享。

—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古代史卷)》分为三部七章,除序章独立外,其余各部均包含两个章节,每章由中日两国学者分别执笔,形成两篇学术论文。因此,全书共有14篇学术论文(报告)构成,执笔者包括15名中国学者和10名日本学者。报告始终贯穿“同一题目,充分讨论,交换意见,各自表述”的主旨,中日学者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各自撰写报告,“最后形成的论文仍是作者本人的观点,但已经吸收了对方的合理意见”(第2-3页)。以下,试将各章内容做一简要介绍。

作为全书开篇,序章的中方报告由蒋立峰、严绍璁、张雅军和丁莉四位学者共同完成,分别从人种起源、语言影响、东亚册封体系等多个角度,鸟瞰了古代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山内昌之和鹤间和幸执笔的日方报告则将写作目光聚焦在了当前,通过介绍研究课题的设计过程和目前教科书所见的中日关系,勾勒出中日历史研究的现状。报告还对共同研究提出了方法论的建议,倡导“克服一国史观”,重视“东亚之海”的新视角。

第一部“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变革”分为两章,分别论述了7世纪和15-16世纪的东亚秩序与中日关系。第一章的中方报告由王小甫执笔。作者以7世纪中期的白江口之战为核心,具体梳理了唐朝、朝鲜三国与倭国走向兵戎相见的道路,以及战后伴随着东亚秩序的重组,唐日罗三国又如何调整彼此的外交关系的脉络。日方川本芳昭的报告独辟蹊径,以“中华意识”作为暗线,讲述了倭国从请求中原王朝册封发展为与之争夺“中华”的历程,由此不难理解倭国为何敢于向唐朝发起挑战。第二章中,中日学者把目光转移到15-16世纪的东亚世界。这一时期,日本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两国贸易随之兴盛。然而,明朝的海禁政策和倭寇的袭扰阻碍了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16世纪末丰臣秀吉更是对朝鲜发动战争,挑战既有的东亚秩序。中方王新生的报告侧重于厘清上述的整个过程,对于中日封贡、

区域贸易和万历援朝战争均有详尽记述。村井章介执笔的日方报告则重视具体问题的分析,不仅对义满向明朝称臣的动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以世界史的眼光阐释了丰臣秀吉崛起背后的经济动因。

第二部为“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形态”,研究对象从政治史转换到了文化交流史。第一章“思想、宗教的传播与变化”,中方宋成有从汉字、儒学、道教和汉传佛教四个角度介绍了中国文化向日本的传播,随后又从假名文字、江户国学和武士道等五个方面分析日本文化的发展,既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又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创造性给予了足够的评价。日方小岛毅的报告则先破后立,开篇首先抛出了时下流行的“日本文化纯粹性”观点,之后从儒学、佛教、朱子学和神道教等多角度切入,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批驳,从而犀利指出:“与其说大陆文化传到日本,不如说由于大陆文化的传播才诞生了日本这个国家”(第283页)。第二章“人与物的移动”,交流内容由文化宗教缩小到了作为载体的人与物。中方学者王勇的报告内容丰富,作者对“徐福东渡”、“太伯后裔”、“秦王国”等移民问题给出自己的解答,又以遣唐使为例,介绍了古代中日间人与物的来往,最后谈及两国之间的“书籍之路”。相对于中方的宏大视角,日方学者采取了专题研究的形式。日方报告由两篇独立的论文构成,分别从经济史和美术史的角度入手,展示了中国货币对日本经济的深刻影响,以及不同时期日本对中国绘画的吸收和改造,以小见大,透视出两国间人物交往的实相。

第三部“中日社会的相互认识与历史特质的比较”,顾名思义,是从“相互认识”和“历史特质的比较”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的。第一章中方学者王晓秋的报告依次回顾了中国历代正史与诗文中的日本形象,又详细列举了明清私人著作中的日本认识,最后得出两国交往的经验与教训。日方学者的报告则分成律令时代和江户时代两个部分,由古濑美津子和小岛康敬分别执笔。前者讲述遣唐使时期的中国认识,涉及遣唐使向中国所求何物的问题;后者在分析“华夷之辩”的基础上,着重评价了江户时代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两人截然不同的中国观。中日学者的报告可谓一体两面,相得益彰。第二章中,中日学者依次从天皇制、科举制、均田制等历史特质分析了两国的异同及影响,日方学者菊池秀明还提出人口迁移和大众宗教的全新视角。对于同一领域,两国学者的关注点也不完全相同。

二

作为共同研究的成果报告,中日学者在行文前经过了充分的探讨,文中多处借鉴了对方的观点。比如,日方学者在序章中提出“东亚之海”的概念,强调了海洋的重要意义。中方学者王小甫在其报告开头为东亚世界定义时就指出:“历史上的东亚在地理上主要包括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居间的大海”(第43页)。海洋不仅是连接中日的纽带,更是众多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又如中方学者王勇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日方学者小岛毅在其报告中也有所借鉴,援引了齋然谒见宋太宗时带去中国散佚已久的《孝经》注释书的事例(第292页)。

除了方法论的例子外,更多的吸收借鉴体现为共同的话题和事例。通读全书不难发现,很多问题是中日学者共同关注的,可以互为参照和补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折扇的事例,作为日本文化反传中国的这一例证,中日学者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王晓秋指出,折扇在宋代传入中国,苏辙的《杨主簿日本扇》反映出中国文人士大夫对精致进口工艺品的喜爱

(第 155 页)。井手诚之辅从美术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引证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指出日本折扇由高丽使者偷偷带入中国(第 331 页),折射出中日艺术交流的一个侧面。中方的序章着眼于策彦周良的《再渡集》,引证日本折扇交换书籍的事例,将折扇与日本刀同列为中国人喜爱的日本工艺品(第 26 页)。

再如,中日学者都对科举制度表示关注。中方报告中不仅全面梳理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兴衰,还指出日本也曾试图模仿,并就日本科举制未能长期延续的原因及影响作出了分析。日方学者菊池秀明则从防止武人专权的角度评价科举制。他指出,10 世纪前后的东亚世界出现了武人当权的局面,包括中国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日本镰仓幕府的建立,以及高丽王朝的武人执政。之所以这一趋势在中国没有长期延续,进入宋代后重新回到文治的正轨,科举制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 402 页)。

江户时代的日本国学也是研究的重点。宋成有的报告侧重于介绍国学的内容,并对其思想启蒙意义做出了积极评价。日方小岛康敬的报告厘清了江户国学对中国评价的发展轨迹,即从憧憬中国的获生徂徕到排斥中国的本居宣长。作者对这一趋势持否定态度,他指出“具有纯粹无瑕的 DNA 的日本文化论,只是一个幻想而已”,本居宣长所谓的“大和心”也是“以‘汉心’为否定媒介而产生出来的”(第 375 页)。

三

尽管中日学者经过了充分的探讨和意见交换,但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两国学者的研究仍具有各自的特色。中国学者善于长时段、大跨度的研究,旁征博引,视野宏大。如王勇“人与物的移动”报告,对隋唐时期中日来往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细的介绍;王晓秋的“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相互认识”对历代正史和诗文做了全局性的整理,贯通清朝之前的整个古代。相对而言,日本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专题形式,从中以点带面,反映出全局问题的一角。如“人与物的移动”一章,日方只选取了经济史和美术史两个侧面;“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相互认识”一章则单独论述了律令时代和江户时代两个时段,尽管无法对整个时段做出概述,但断代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此外,中国学者擅长对历史问题做出总结与分析,如宋成有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还分别对其特点作出了概括;王晓秋则在梳理历代对日认识的基础上,总结出两国相互认识的促进和阻碍因素。日本学者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更敢于对前人的观点提出质疑。村井章介在报告中对堪称经典的“义满篡位说”提出了反驳,对丰臣秀吉不接受明朝册封的原因也给出了新的解释(第 262、278 页);菊池秀明从律令制定的角度出发,结合坂上康俊的新说,对 702 年遣唐使出使目的提出了不同于通说的看法(第 385 页)。

以上是两国学者在行文上的特点,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更值得注意。大到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分析与评价,小到具体史料的认识,两国学者都坚持自己的表述,这也正是“各自表述”这一主旨的立意所在。

天皇称号的形成问题在学界争论已久。中国学者主张强调其与道教的联系,宋成有援引津田左右吉的研究,主张天皇称号直接来源于道教(第 90 页);“中日政治、社会构造的比较”报告也赞同这一点,文中以大量篇幅论证道教传入日本,由此证明道教对天皇称号的影响。日本学者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菊池秀明认为,倭国政府与隋朝交往最初提出了“天子”的称

号,即著名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国书,只因遭到隋炀帝的呵斥,才退而求其次地采用了“天皇”(第379页)。又如对于万历援朝战争,中日双方都同意这是对东亚原有国际秩序的冲击,但王新生在梳理战争全过程的基础上,更侧重战争给三国带来的破坏(第82页),村井章介则着眼于16世纪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白银流动,将丰臣秀吉与努尔哈赤的动向共同定位为“以边境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崛起的强大军事集团对中华主体——明朝进行的挑战”(第279页)。

对于具体史料的不同理解,学者间分歧更多,这里仅举其中两例。《南史·倭国传》记载:“齐建元中,除武持节、都督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镇东大将军。梁武帝即位,进武号征东大将军。”《南齐书》和《梁书》均有相同的记载。王小甫认为,“勘比史料,应该认为齐、梁进授倭王官号是在倭方与中国交通遣使的情况下发生的”(第45页)。川本芳昭则主张,倭王向南朝皇帝遣使止于478年(第240页)。换言之,倭国并未直接与齐梁交通,上述册封应属于遥封。又如,608年第三次遣隋使节小野妹子所带国书云:“东天皇敬白西皇帝”。针对其中的“东天皇”一词,王勇援引《异国牒状记》主张应是“东天王”之误(第124页);菊池秀明则继承吉田孝和堀敏一的观点,对“天皇”的用词持肯定态度,认为在“7世纪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产生了这个称号”(第379页)。

四

本次共同研究的人员不仅包含项目委员会的成员,还邀请了外部专家参与执笔。这些学者都来自著名的研究机构,在各自领域也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可以说,此次共同研究汇集了中日学界在该领域的顶尖学者,报告书的学术水平无疑是上乘的。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报告中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除因多人执笔而统稿困难、优劣不一等技术性问题外,尚有几处具体观点值得进一步探讨,笔者斗胆在此举其二三。

中方报告的序章第四节中谈到,《北史》和《隋书》记载,公元608年隋使裴世清“使倭国,渡百济,行至竹岛,南望耽罗国(推测即新罗),经都斯麻国,迺在大海中”(第16页)。作者以括注的形式将耽罗国注释为新罗,笔者认为这一推断不妥。“耽罗国”也作“儋罗国”,即今天的韩国济州岛,《新唐书·东夷传》记载其“初附百济,后附新罗”。^③济州岛作为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间的中间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同文第四节提及,《新唐书·日本传》首次记载了自神武天皇到光孝天皇的谱系,推测是“依据日本古文献或者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口述记录的”(第32页)。笔者对于这一推断并无异议,但认为可以作更加精准的定位。《新唐书·日本传》的天皇谱系直接来源于日僧裔然向宋太宗进献的《王年代记》,这一《王年代记》早已失传,但其文字保存在《宋史·日本国传》中。通过对比《新唐书·日本传》和《宋史·日本国传》中天皇谱系的文本即可得知,两者均是由《王年代记》衍生而来,只不过《新唐书·日本传》的谱系中加入了更多的裁剪和讹误。^④

中方“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相互认识”报告的第二节对历代正史的对日认识进行了梳理,论及《宋史》时作者指出,“《宋史》的一个特点是把‘四夷传’改为‘外国传’,这可能与元朝时蒙古族统治有关”(第151页)。这一论点值得重视,但笔者认为,“外国传”的设立更多应归结为近世国家观念的转变,即开始摆脱汉唐以来传统的天下观,对周边诸国开始给予平等的认识。这一转变从宋朝就已经开始,并且很可能与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长期并立的现状有关。^⑤

限于篇幅,此处只举一个侧面的例子。日僧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载,熙宁五年(1072)十月,宋神宗曾向其询问过日本国内的情况,其中有一段涉及日本国王的称号:“(神宗)一问:本国王甚呼?(成寻)答:或称皇帝,或号圣主。”^⑥此前,中原王朝一般将日本天皇称为“倭王”或“日本国王”,视作天下秩序中的一员。此处相比于隋炀帝对“日出处天子”的震怒,宋神宗却未对日本国王使用“皇帝、圣主”等称号提出任何的指责。可见,中原王朝对于周边国家的观念比照隋唐时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史》将“四夷传”改设为“外国传”,也应当在这一背景下加以阐释。

最后,中方“中日政治、社会构造比较”报告的第一节中论述了道教对日本社会的深刻影响,其中写到“因佛教不能神化天皇,崇佛派的苏我势力遭到打击,革新势力学习唐朝皇帝利用道教巩固政权的做法,将道教的教理和仪式同日本固有的宗教信仰以及关于天皇的传说相结合”(第171页)。苏我氏作为崇佛派应当无误,但是否因为其崇佛而招致了打击?结论是否定的。“乙巳之变”后,以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并未放弃佛教而转向道教。僧旻等佛教人物在新政府中担任国博士等要职,推动着“大化改新”的进程,天智天皇本人也始终信仰佛教,唐使访倭时还曾赠送他阿弥陀佛像,^⑦天武、持统天皇相继建立了大官大寺和药师寺,可见佛教不曾让位于道教。那么,如何从宗教角度理解苏我氏的衰亡呢?田村圆澄的《大唐学问僧的归国与苏我氏的灭亡》^⑧一文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作者认为,苏我氏主导的佛教是梁朝以来的南朝佛教,通过百济传入倭国,一度被苏我氏所垄断。但随着舒明天皇继位后修复与新罗的关系,遣唐学问僧经由新罗陆续归国,北朝佛教沿着“唐—新罗—倭国”的路线不断传入,正迎合了倭国统治者强化王权的需求。由此,苏我氏逐渐失去佛教界的领袖地位,最终走向了灭亡。

此外,本书还有若干刊误,笔者一并摘录如下:第26页“策彦周良《在渡集》”应为“策彦周良《再渡集》”;第151页“后晋刘询”当作“后晋刘昫”;第349页“菅原道真”应是“菅原道真”;第320页,译者将“きとら古坟”音译为“开特拉古坟”,学界通常译作“龟虎古坟”;同页“圆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应该是“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等等。

王晓秋在“中国与日本人的相互认识”报告中指出,阻碍中日友好往来的因素之一就是“两国人士在著述中相互攻讦、轻蔑和矮化对方”(第167页)。其间的根源无非在于对彼此差异缺乏了解而引发的误会。菊池秀明在报告中提到,“大多数日本人都认为自己……跟‘武’,特别是与拥有、使用刀枪之类武器变得无缘”,而中国人“因为受到倭寇以及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的影响,认为日本等于一个崇尚武力的危险国家”(第395页),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消除误会、增进理解,这也正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在古代史研究上的合作还十分有限,特别是中国学界对于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⑨此次共同研究应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既有助于消弭两国间因认识差异而引发的种种误解,也为中日学界的交流合作提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注 释:

①步平、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报告》(古代史卷、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以下不作特别说明者,皆出自本书的“古代史卷”。

②林晓光:《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基本情况与几点思考》,《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4期;庄司润一郎、于文浩:《“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之回顾:以南京事件为主体》,《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步平:《中日共

(下转第46页)

摸索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略述研究交流进程中的点滴感悟

赵建民

东亚地区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早一体化的区域,且有它的独特性,即有汉字、儒学、佛教及律令这四个共同的元素,结成了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等不同名义而实质上是一样的共同体。以“东亚”作为视域来研究中、日、韩(朝)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这本身就可作为一种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理论和方法,且已被学者们所广泛应用。当然,根据各人的研究实际可以摸索出各具特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笔者出生于1938年1月5日,那时正处于“南京大屠杀”和中日间战火频仍的战难中。大概跟这历史背景有关系,故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我选修了第二外语(日语)和“日本史”、“日本经济”、“亚非经济”等课程,撰写了《日本法西斯的形成与衰败》、《明治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资本主义发展》等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然而,我真正从事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是从1980年秋在辽宁大学参加了由日本学者讲授的“日本古代史讲习班”开始的。在以此为始点的35年里,我从中日文化关系史、日本史、东亚地区文化交流诸方面着手教学和课题研究,从而逐步形成了研究格局和富有个性化的研究特色。

我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最早是从研究“中日文化差异及其历史原因”开始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谈论中日文化关系时往往以“同文同种”来表达。而从我的研究所得,认为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当然也不赞同日本有的学者所主张中日两国是“异文异种”的观点。我采用了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理论和事实以及历史地理环境方面的演进,阐明中日文化关系“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但不同中有同、同中有不同,中日两国的文化虽同属东方文化但具异质性”。^①

1992年上海市与大阪府建立友好城市20周年纪念时,由大阪府国际交流财团和上海市友城基金会联合在大阪举办“中日文化交流讲座”,本人应邀作了四场讲演,其中有“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及其历史原因”一讲。在讲演会上有听讲者表示赞同我的观点,并说“同文同种有很大的危险性”。为了准确认识“同文同种”观,针对“有害无益”、“有益无害”、“无益无害”诸说,我又撰写了《“同文同种”观辩异》,^②阐明中日文化间不仅要了解它们的相同处,更重要的是要寻找相互间的不同,只有认识差异才能真正了解对方,认识差异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和前提。

图书交流对中日两国彼此的认识很有影响,清朝时大概有70%的图书品种流入日本。关于作为“域外汉籍”的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在中国的逆输出,我曾撰写过《论〈日本外史〉的撰刻和在中国的流传》,^③其间得到了赖山阳亲族后裔如广岛大学文学部赖祺一教授的热情指教,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赖惟勤先生在医院里接待了我,并赠其先祖赖成一的《日本外史的精神与释义》和他担任责编的日本名著《赖山阳》,后又寄赠了若干

家藏资料。我在 1993 年参观了广岛的赖山阳史迹资料馆,在我谨呈了拙作《赖山阳的〈日本外史〉与中日史学交流》^④后,收到赖山阳文化纪念财团会长石松正二先生来函并赠送《赖山阳全书》一套八卷给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1997 年,我获日本住友财团的“赖山阳史学思想研究”的项目资助,组织八名史学研究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日本外史》读书会”活动,由其各自写出 5000 字以上的读书报告;作为研究课题结项,我撰写了《赖山阳史学思想试论》,^⑤探寻中日间在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价值判断、心理素质诸方面的异同。

中日文化差异除历史演进、地理环境、生活状况等本身原因之外,还受到外界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欧洲近代文化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同影响。究其原因,在于中日两国在吸收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方法、态度和思想认识上的差别。因此,我进行了“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的研究,撰写了《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中的作用》、^⑥《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考察》、^⑦《中日两国吸取欧洲近代文化的比较》^⑧等数篇论文,并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在两国五地的学术杂志上。

中日两国摄取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这一研究,对认识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及其差异的原因是极为重要的,也能体现出我国学者所具有的研究优势——有条件跟国外相关研究的学者开展平等对话。1991 年 5 月,我在昆明的“世界中世纪史学术会议”上作了《从中日两国吸收欧洲文化的差异看两国从中世向近代的过渡》的报告,还参与了筹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比较史学分会”的工作。1998 年 10 月,我在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作《从文化层面看日本的国际化》的讲演,此后曾跟该校的学者开展“十九世纪末东亚知识层对西学东渐的回应——以崔汉绮、吴汝纶、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教育观比较”的共同研究(后因故提前回国而未写出研究报告)。我从研究过程中总结和归纳出“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作为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一种理论和方法。

古代的中日两国关系素称“两千年友好”。其实,从“白村江之战”的公元 663 年至 1598 年间,就有五次中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其中有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战胜国没有战胜国应有的形象,而作为战败国却在战争中获益甚丰,如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败北却激起了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热潮,迎来了奈良时代的繁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失败,却从朝鲜俘获了大量技术人材,获取了珍贵图书,致使江户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兴旺发达;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对华战争尽管最终失败,却从战争中获益颇多,且在战后充分发挥了作用。

对于日本对外战争的研究,我除了撰写《“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⑨外,主要研究战争过程中的文化,也即图书掠夺等问题,其间曾获得台湾金禾出版社郭俊鈺社长热情支持,也曾得到美国马里兰大学薛君度教授主持的黄兴基金会的“日本侵华时期破坏中国文化财产的实情”研究项目的资助,撰写了《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文化财产的破坏和掠夺》、^⑩《略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⑪《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文物掠夺》、^⑫《占港日军劫掠冯平山图书馆之始末》^⑬等多篇论文,也即主要关注战争中的文化问题,从大量史实研究中得出了“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论断。当然,文化交流有平等的、自由的、互惠的与不平等的、强制的、掠夺的之区别。战争过程中的众多文化问题也是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研究课题,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实、预示未来是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教育交流在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也极为重要,其范围包括了东亚的中、日、韩(朝)诸国跟西方交往的研究。我在 1999 年 1 月起的半年时间里,于鸣门教育大学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教育交流”的合作研究,撰写了《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⑭《森

有礼的 *Education in Japan* 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后一篇论文研究森有礼(1847-1889)在 1873 年美国编纂出版、后经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翻译的《文学兴国策》在中国的出版,该书日文版直到 1963 年才完整出版,故对英、中、日三个版本很值得作比较研究。后对在原稿上加了副标题“兼论异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添补了相应内容,由鹿儿岛国际大学经济学部田尻利教授译成日文,发表在东京的《国际教育》第 8 号(2002 年 10 月)上。

派遣和接纳留学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或纽带。我在日本大阪等地作过“中日两国的发展与留学生的作用”等讲演;撰写过《派遣和接纳留学生的理念和事实——中日关系史上三次留学高潮的回顾和思考》^⑤等。中国派人赴日访问考察、翻译图书、派遣留学生等均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它们对加深相互理解、中国“照猫画虎”式地学习西方、推进教育改革和整个近代化运动的进程都起到过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我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94 年 8 月,我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从西欧向东亚的移动》,倡议并获准建立了“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东亚研究中心”。1995 年 10 月,在北京的“21 世纪中日关系展望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应当重视东亚地区史的共同研究——21 世纪中日关系发展不可忽视的课题》。^⑥此后,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1998 年 8 月与日本东海大学文明研究所共同举办“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围绕长崎的历史和文化为中心”会议;2003 年 3 月与日本西博尔德大学国际情报学部共同举办“上海与长崎间交往研讨会”,在这两次会上分别作了基调报告《志筑忠雄的〈历象新书〉翻译与儒学自然观》^⑦和《上海长崎间交往史实撮要与现实思考》。^⑧1999 年 6 月,我在长崎西博尔德大学作了《中国人眼中的志筑忠雄》报告;2001 年 10 月作了《历史的视点:从长崎看中日文化交流》的演讲。2002 年 11 月,在韩国东亚教育学会(釜山海洋大学)作了《〈新历史教科书〉的要害:欲使日本重显战争“雄风”》的演讲,^⑨强调我们不仅要批判日本新教科书观点、体系,还应该由中韩日学者联合起来共同编写《东亚史》,把正确的历史真实教授给年青一代。

作为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一部分,1607 年至 1811 年 200 来年的朝鲜通信使访日历时长、规模大、影响深远,迄今仍是韩日两国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朝鲜通信使访日本身是朝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但两国使者的交往和笔谈大都涉及中国,或者说是相互在打听对方对中国的种种态度和看法。何以朝日两国使者都关注中国呢?我于 2001 年 10 月在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17-19 世纪初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朝鲜通信使访日与朝日两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⑩这是中国大陆学者最早从中国的角度撰写的对朝鲜通信使的研究论文,揭示了朝日两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以及朝鲜通信使致使日朝两国从战争到和平、再从和平到战争的变化,以及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影响,这也是日本对中朝两国从亲密转变为蔑视的转折点。从朝鲜通信使往来的实际进程看,恐怕只能说是外交往来,即使称作“文化交流”,也绝不能说它是“友好交流”吧!

2012 年 10 月,我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幅近世近代中日交流的文化地图——从〈日本外史〉〈日本教育〉中窥探跨文化传释》的学术讲座。所谓“跨文化传释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由在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叶维廉先生所提出的。我把它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视域,也即视作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传释”是双向互

动,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还有第三方参与)。目前正在运用这种新的理念和方法来对我称为“国际人”的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作更深入全面的探究。^⑩

出生于德国、服务于荷兰、两次被派遣到日本工作数年的西博尔德,是开拓日本近代文化的恩人、欧洲日本学的始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也是卓智善谋的外交家、贸易家。他得到过印尼华侨郭成章的帮助,还到过上海,参观过徐家汇天主教堂,到郊外采集植物标本,开辟从上海至长崎的轮船航班还是由他最先提出的。他是迄今为止被日本学者研究最多的一个外国人。2016年将是西博尔德诞辰220周年、逝世150周年纪念,笔者准备以“跨文化传释”的理念和方法来提升西博尔德研究的新境界。

今年两三月间,我受邀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时一个月的有关西博尔德和印尼华侨郭成章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在设施现代化、管理体制科学、服务人性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生活一个月,深深感受到日本学者在学术交流上的优越条件和满腔热情,激励着自己“夕阳正红无限美,余热生辉有所为”,再度焕发出学术研究的激情,拟撰写《西博尔德评传:以中国和中日关系研究为中心》和论文《郭成章对西博尔德研究日本的贡献》,在日本对西博尔德研究经久不衰的氛围中,开拓日本史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境界。

东亚区域文化交流史研究,是一个既老又新的研究领域,有着极为丰富和有待挖掘的矿藏,因此需要东亚地区的各国学者携手进行合作,对涉及中韩日共同的问题作深入研究。就中国学者本身而言,一方面要很好地学习日韩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经验,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更富现实感和针对性,要坚持创新是学术的永恒生命力,力争能体现出中国学者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的特色、风格和气派。笔者从30来年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受到研究和交流是相辅相成和互为因果的:研究推动了交流,交流又促进了研究。

这次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的一个月间,我拜访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朝鲜燕行使、朝鲜通信使研究的权威学者夫马进先生,会面时他惠赠刚出版尚未上市的700余页的洋洋巨著《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伊东贵之教授充分交流研究心得,取得诸多共识;还到冈山拜谢我在撰写《日本由本草学趋向植物学研究的转机》一文时引用的作者高桥辉和先生,会面时他赠送其新著《丸龟德国兵俘虏收容所物语》给我。复旦大学历史系系友、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到车站迎送,两次亲自驾车百余公里,使我有幸前往津山洋学资料馆和牛窗朝鲜通信使资料馆实地访问考察,获得了很多感性知识,姜教授还赠我《浮田和民的思想史研究》、《石桥湛山》(人物丛书)等著作多部;日本研究西博尔德的著名学者、东海大学石山楨一、沓泽宣贤两先生都以“特快专递”给我邮来了《新西博尔德研究》、《西博尔德生涯中的诸人》、《西博尔德年表、生涯与业绩》等新著。

东海大学教授森睦彦先生曾承担日兰学会编集、箭内健次监修的《洋学关系研究文献要览》(1868-1982)一书的主要参撰者工作。1998年,他对我说该书“是我家里仅存的一本,送给您比放在家更有意义”。确实,此书此后成为我经常翻阅的重要工具书。我还从其获赠《国际社会的形成与近世日本》、《黄昏的德川:西博尔德父子眼中的日本》等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广田昌希先生在日本的大学中最早设立日本学科并担当首任学科主任,我与其交往已有20余年,当他得到我在日本访问的信息后随即联络,在京都站晤面,在能环顾京都美景的松山阁进餐,进行了整整大半天的晤谈,讲述从江户时代的“厕”到现实生活中的“化妆室”的演绎进程。他还签名赠送给我由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2月初版、1980年2月再版的成名作《福

泽谕吉研究》，以及 2008 年出版的《从歧视看日本的历史》等作为留念。今年是广田先生伞寿纪念，我们在车站检票口依依不舍、互致问候、挥手告别。会面尽管短暂，学术交流的情谊却将永恒！

上述列举的若干研究交流内容，大部分已收录在本人所著《晴雨耕耘录——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 4 月）中，祈盼不吝批评指正。

注 释：

①赵建民：《概论中日文化关系及其思考》，《中国文化研究》，1994 年秋季卷。

②《日本研究集刊》，1994 年第 1 期。

③《汉学研究》，第 14 卷第 2 期，1996 年 12 月。

④《贵州大学学报》，1992 年第 2 期。

⑤《日本学》第 13 辑，2006 年 3 月。

⑥《学术月刊》，1987 年第 12 期。

⑦《世界历史》，1989 年第 3 期。

⑧《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1992 年 6 月。

⑨《世界历史》，1997 年第 3 期。

⑩《档案与史学》，1997 年第 2 期。

⑪《近代中国》，1997 年第 12 期。

⑫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2004 年 12 月。

⑬香港：国民教育中心网站，2011 年 11 月。

⑭《档案与史学》，1999 年第 5 期。

⑮同济大学亚太研究论丛《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2002 年 8 月。

⑯《中日关系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⑰《日本研究集林》，1998 年第 2 期。

⑱《档案与史学》，2003 年第 4 期。

⑲《日语日文学》第 19 辑，2003 年 5 月。

⑳《东北亚学刊》，2002 年第 2 期；《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新探》，大旺社，2002 年 10 月。

㉑西博尔德：日本开国的“第一诱导者”，《社会科学报》，2003 年 11 月 20 日；《西博尔德的日本研究及其国际影响》，《复旦学报》，2002 年第 4 期；《日本由本草学趋向植物学研究的转机——西博尔德对日本自然史研究的贡献》，《日本学》，2003 年 12 月；「日本における本草学から植物学へ—東西交流」、郭南燕ほか編著『小笠原諸島—アジア太平洋から見た環境文化』、平凡社、2005 年。

（赵建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胡令远）

中心大事记

2015 年上半年

- | | |
|------------------|---|
| 1 月 5 日—2 月 1 日 | 徐静波教授赴日本东洋大学访问,在该校作“中国人眼中的日本”、“谷崎润一郎与中国”、“武田泰淳与中国”、“堀田善卫与中国”、“我所理解的日本饮食文化”等五次演讲。 |
| 1 月 16 日 | 以欧洲局参赞武藤显为团长的日本外务省访问团一行五人访问复旦大学,在中心与校内相关院系的日本研究专家座谈。 |
| 3 月 6 日 | 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米田麻衣与高比良飞鸟来访。 |
| 3 月 10 日 |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任命袁堂军教授担任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
| 3 月 10 日 | 日本三菱文具株式会社数原英一郎社长率团访问复旦大学,王生洪荣休校长等在中心接见,胡令远主任、沈浩老师陪同。 |
| 3 月 12—15 日 | 张浩川副教授赴日本访问外务省、财务省、国际交流基金等机构。 |
| 3 月 13 日 | 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江口伸吾教授来访。 |
| 3 月 16 日 | 日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伊藤元重教授来访,并与复旦大学日本研究学者座谈。会后,伊藤教授在逸夫楼为校内外师生近 200 人作题为“安倍经济学的展望”的主题演讲。 |
| 3 月 21—22 日 | 中心选拔的四位博士生赴北京大学参加“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博士生日本研究论坛 2015”。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 3 月 24 日 |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中心”研修会,由该中心副理事长牧野长生主讲,我校日语系学生、日本留学生以及在上海友好人士 10 余人参加。 |
| 3 月 25 日 | 徐静波教授在山东师范大学作“东亚区域交流中的日本饮食文化”的演讲。 |
| 3 月 27 日 | 日本名古屋大学木村宗七名誉教授、中京大学经济学部山田光男教授等来访。 |
| 4 月 1 日—8 月 31 日 | 徐静波教授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任招聘研究员。 |
| 4 月 1 日 |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产业调查部加贺林阳介科长和经济调查室研究员岳梁来访,戴晓芙副教授接待。 |
| 4 月 17 日 | 复旦大学与三井物产冠名讲座捐赠仪式在中心举行。复旦大学副校长冯晓源、三井物产(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宇都宫悟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 |
| 4 月 20 日 | 日本卫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古宪生先生一行五人来 |

	访。
4 月 22 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上海美国研究所主办的“琉球的国际法地位研讨会”。
4 月 23-24 日	贺平副教授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参加“如何重振 20 国集团？”国际研讨会。
4 月 25 日	徐静波教授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何谓现代 / 世界？”研究班主题为“以人文学的视角来看待现代与世界”的研究会。
5 月 8 日	徐静波教授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何谓现代 / 世界？”研究班主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纪：自战争期间至后冷战时期”的研究会。
5 月 11 日—6 月 19 日	中心举办 2015 年度复旦·三井物产冠名讲座。本年度一般公开讲座“中日人文艺术”分为三讲：5 月 11 日，“中日绘画背景的差异”（旅日书法绘画艺术家王俊主讲）；5 月 25 日，“柴烧的艺术魅力”（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包春雷副教授主讲）；6 月 19 日，“在无色处见繁花——离开日本看日本”（中国美术学院郑巨欣教授主讲）。校内外师生、社会人士共计近 200 人参加讲座。
5 月 12 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上海环太战略中心举办的“台海局势研讨会”。
5 月 15 日	徐静波教授在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作题为“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以堀田善卫为中心”的演讲。
5 月 19 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报告会，主题为“日美同盟与台海、南海安全困局”，袁堂军教授主持。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上海东亚研究所副主任胡凌炜研究员、中心贺平副教授分别作主题发言。
5 月 19 日	中心举办“复旦大学池田大作思想研究中心”研修会，该中心副主任戴蓉老师主讲，我校日语系学生、日本留学生以及在上海日本友好人士 12 人参加。
5 月 21-22 日	贺平副教授赴南非开普敦大学参加中非论坛。
5 月 22 日	徐静波教授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何谓现代 / 世界？”研究班主题为“音乐史中的第一次大战是现代的起点吗——以 1970-1990 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为中心”的研究会。
5 月 23 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扩大会议及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主办的“第 6 届全国日本研究杂志研讨会”。
5 月 23 日	中心与上海市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共同举办“中日关系座谈会”，日本内阁府政务官越智隆雄主讲，校内外知名专家出席。
5 月 28 日	胡令远教授出席上海市日本研究交流中心举办的“中日关系现状及对策研讨会”。
6 月 1 日	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经济部马场优司领事在复旦大学就日本财政问题开设讲座。
6 月 3 日	日本立正大学地球环境科学部山下伦范教授、讲师白木洋平博

- 士、日本圣学院石部公男名誉教授、日本福岛大学人间发达文化学类中村洋介副教授率领的日本立正大学地球环境科学部 17 名本科学生来访。戴晓芙副教授和奚玲博士后参加了接待。
- 6 月 6 日 胡令远主任当选上海市日本学会副会长。
- 6 月 9 日 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经营学部关口和代教授来访。
- 6 月 13 日 徐静波教授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何谓现代 / 世界？”研究班主题为“现代世界史的视点：漫长的 20 世纪论及其周边”的研究会。
- 6 月 17 日 日本庆应大学国际合作推进室事务长隅田英子和课长鹤尾宁来访。
- 6 月 21 日 中心举办“日本的安保法制动向与中日关系”研讨会，原日本外务省局长东乡和彦、京都产业大学法学部教授中谷真宪等主讲。
- 6 月 23 日 日本卫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一行六人来访中心。
- 6 月 26 日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郝斌教授、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李玉教授等来访，商谈合作事宜。
- 6 月 27 日 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 21 世纪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多胡圭一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华立教授一行来访。
- 6 月 29 日—7 月 1 日 贺平副教授赴俄罗斯莫斯科参加金砖国家公民论坛。

(华 莉)